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世界五千年

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 (5)

## 下



世界五千年  
——影响人类历史 200 件大事

## 司马迁写《史记》

我国有五千年的文明传统，记载着光辉灿烂中华文化的历史典籍多如牛毛，其中最主要的最有系统性的是“二十四史”；而在二十四史之中，最优秀的一部史书当数司马迁写的《史记》。司马迁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他的《史记》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一部划时代的宏篇巨著。它是我国第一部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我们华夏族的祖先之一写起，一直写到汉朝汉武帝元狩元年（即公元前 122 年），并且《史记》还吸收了过去史书的许多特点，开创了我国历史著作中的经传体例。这部伟大的著作至今仍成为人们首推的史书之一，司马迁也成为人们所推崇的历史伟人。

司马迁，字子长，是我国西汉时期夏阳人，夏阳在今天陕西省韩城县南。他父亲司马谈是一位历史学家，在朝廷中担任太史令的官职，负责编修前朝与当朝的史书。司马谈希望儿子能够继承自己的事业，所以从小就对司马迁进行十分严格的培养。司马迁 10 岁的时候，就诵读《左传》、《国语》、《尚书》等古代流传下来的历史书，在历史和文学两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与汉武帝在位的时间基本上相始终。当时，汉朝的经济发展，政权巩固，学术文化繁荣，国势强盛，疆域辽阔，涌现了大批出类拔萃的人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作为一种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斗争服务的意识形态，在当时就需要有一部贯通古今、综合百家之说的史书，而且当时对先秦古籍的搜求和保藏，又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为编写这样的史书提供了可能。

司马迁读书，遇到疑难问题，总要反复思考，寻根究底。他也喜欢寻访名胜古迹。从 20 岁那年起，司马迁到全国各地去游历。往南，他到过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最远到过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据说夏禹曾在会稽召开过各部落的酋长大会，在会稽留有禹穴的古迹。司马迁特地到禹穴进行了实际考察。他还爬上了今天湖南省境内的九嶷山，眺望了三湘的秀丽景色，并且还在沅水和湘水中泛舟，饱览了水光山色。往北，司马迁渡过汶水、泗水，到过春秋战国时代齐国、鲁国的首都，实地考察了孔子、孟子当年给学生讲学练武的遗迹。每到一地，凡是古代历史记载或传说中出名的地方，司马迁都要亲自去考察游览，访问当地的老年人。他听说战国时代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修建了都江堰，能防洪和灌溉，就特地跑到四川，爬上岷山眺望，到都江堰的离堆上去踏勘。他听说秦始皇灭亡魏国的时候，曾经引黄河水去淹魏国首都大梁城，就特地跑到大梁，观察了城墙上当年被水淹过的痕迹，向老年人询问水淹大梁的惨状。他听说屈原怀才不遇，自沉汨罗江而死，就特地跑到长沙，在汨罗江畔凭吊了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这样广泛的游历，实地的考查，虚心地访求，使他广泛地接触了各阶层的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在民间收集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和传说，了解和熟悉了许多古代遗迹如战场的地理环境，大大丰富了他在各方面的知识。并且，祖国的大好河山，无数优秀前人的业绩，开阔了他的胸怀，陶冶了他的情操，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

漫游回来不久，他就应朝廷之召，做了个郎中令的小官，郎中是为皇帝当差的宫廷官员，职务虽然不高，却可以经常与皇帝接触，了解最高统治者的日常活动。司马迁在这个职位上一干就是二十余年，很得汉武帝的宠信。这一段生活经历使得司马迁有机会直接了解皇帝、大臣及其亲信的大量内部材料，为他将来创作史书准备了许多原始素材。

司马迁 36 岁那年，父亲司马谈因病去世。父亲生前正在着手编写一部历史书，刚收集了一些材料，写了几篇，没有写完。临死以前，父亲拉着儿子的手再三嘱咐说：“汉朝兴起以后，海内又统一了，上面有贤明的君主，下面有众多的忠臣义士。他们的事迹都很丰富感人，我们做太史令的，如果不能把他们的业绩记载下来，就算失职。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把书写完。”

两年之后，司马迁接替父亲的官职，出任太史令；他牢记父亲临终前的嘱托，上任伊始，就开始准备编写司马谈未完成的历史书。

当时，西汉皇家图书的收藏已经非常丰富，他做了“太史令”，就可以利用职务上的有利条件有机会读到外面所看不到的重要书籍和资料，通过艰苦的劳动，他对这些数量庞杂的材料进行了一定整理、考证，着手《史记》的准备工作。

可是，在司马迁 48 岁那年，一件不幸的事情突然降临到了他的身上。司马迁有个老朋友，名叫李陵，被派去征讨匈奴。由于孤军深入，粮尽援绝，被匈奴包围俘虏了。尽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但是匈奴兵越来越多，汉军寡不敌众，后面又没救兵，最后只剩了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李陵变节投降的消息传来之后，朝廷上下一片震惊，汉武帝更是气得暴跳如雷，他下令将李陵的母亲以及妻子儿女一起抓来投进监狱，并将李陵的罪行公诸于众，召集大臣，让大家讨论应如何惩治李陵的罪行。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跟李陵认识了多年，而且两家是世交，关系很好，对李陵也比较了解。他说：“李陵平时对母亲孝顺，对朋友讲信义，对人礼让、谦恭，自守贞操，能急国家之所急，人才难得，而且，李陵带去的兵不到五千人，他不顾个人安危，勇敢进攻，深入到匈奴军队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听了这话，勃然大怒，认为司马迁是在为投降敌人的李陵辩护，是与李陵一样不忠于朝廷的罪人，应该从重治罪。武帝把袖子一甩，命令武士抓起司马迁，将他交给廷尉审问。

廷尉不敢违抗武帝的旨意，加紧审问司马迁。后来案子落到著名的酷吏杜周手里，司马迁受到的折磨就更加严重了。

不久，有人报告汉武帝说李陵亲自带兵攻打汉朝，武帝信以为真，非常气愤，马上下令将李陵的母亲及妻子儿女一律处死；司马迁也被牵连判处死刑。

按照当时的刑律规定，被判死刑的人有两种减免办法，一种是用钱来赎罪，向国家交纳五十万钱，可以免人一死；另一种是用宫刑代替死刑，宫刑又叫腐刑，是割去男子的生殖器的一种极端残酷的肉刑。当时许多人宁愿一死也不愿受宫刑。面对悲惨的命运，司马迁想到了死；但是，父亲未完成的历史书还等着他去完成。终于，司马迁为了事业选择了苟且偷生这条路，接受了宫刑的惩罚。他决心要坚强地活下去，把那部历史书写完，以了结父亲与自己多年的心愿。他以史书上记载的许多坚强不屈的人为榜样，决心向命运挑战。他想，从前周文王被关在羑里，写了一部《周易》；孔子周游列国的

路上被困在陈蔡，后来编了一部《春秋》；屈原遭到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写了《国语》；孙臆被剜掉膝盖骨，写了《兵法》。还有《诗经》三百篇，大都是古人在心情忧愤的情况下写的。这些著名的著作，都是作者心里有郁闷，或者理想行不通的时候，才写出来的。我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时候把这部史书写好呢？

于是，他把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为止的这段时期的历史，编写成130篇、52万字的巨大著作《史记》。

这部书凝聚了司马迁的全部心血，是一部体系完整，内容丰富的史书，其中包括本纪十二篇，用来记载自黄帝到汉武帝历代帝王的事迹；表十篇，用列表的方法记载大事和重要人物，补充本纪；书八篇，记载重要的典章制度、天文现象、政治设施和社会经济生活；世家三十篇，记载诸侯王和孔子、陈胜等特殊重要人物的事迹；列传七十篇，记载重要人物、少数民族和邻国的历史。其中最重要的是本纪和列传，“列传”是在《史记》中所占比例最重的部分，是对历代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文学家、医学家、重要官吏、游侠、刺客等人物所作的传记，还包括了我国古代国内外少数民族的历史。因此后人称它为纪传体史书。自从《史记》首创了这种纪传体以后，中国历代的正史，即通常所说的二十四史，基本上都是以《史记》作榜样，采用纪传体这种形式来写的。《史记》中的“本纪”，“世家”、“表”、“书”、“列传”之间互相紧密纵横地联系，而不是彼此孤立，其中的“纪”、“传”更像构成全书的经纬线一样编织起来一部系统、周详的“珍品”。正因为这种经纬的有机结合，所以能够分别安排组织，用司马迁的话就是“把天下散失的历史传闻收集起来，并且上下前后贯通，拾遗补阙，弥补六艺的缺漏，取舍有关六经的多种不同著述，统一归纳百家杂语，而成一家之言”。写出这一空前著作，奠定了封建时代作史的基本格式，这一点，是司马迁对中国文化最伟大的贡献。后人称《史记》是史学家著书的“终极规范”。在西汉以后陆续写成的二十三部史书中，都无一例外地继承了司马迁创造的“纪”、“传”的体例。《史记》是二十四史的开山祖师；至于那些正史之外的多如牛毛的纪传体野史、别史，实际上也都继承了《史记》的伟大体例。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肃认真，他对他所收集、掌握的大量资料并非原封不动地加以照搬，而是对所写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并且对照补充他从实际考察所得到的材料。所以，经过司马迁的创造性劳动，就远比那些原始资料完整得多，系统得多，也可靠得多了。

无论是对书面材料，还是对亲自调查得来的第一手材料，司马迁都要进行认真地分析、鉴别。如对传说中的“五帝”的世系，就曾经将书面材料同实地调查放在一起，进行详细考证。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窃符救赵”的故事：魏公子信陵君礼贤下士，听说“夷门监者侯生”是个非常贤能的人，就派人去请侯生，侯生已是个70多岁的老头了，家中很贫困，但他对来请的人说：“我几十年来行为很端正，虽然做个看城门的小差事，但决不因为家穷就接受公子的财礼。”信陵君听了，就大会宾客，亲自驾车去夷门迎请他，侯生在路上，故意下车与他的一个朋友——屠夫朱亥谈话，谈了很久，信陵君却毫无怨色，到了家，信陵君请侯生坐上座，众多的宾客感到很惊奇。后来，赵国因为受到秦国的进攻，魏王不敢得罪秦国不肯发兵救赵，信陵君用侯生的建议，让如姬盗出了魏王的虎符，发兵去救了赵国。司马迁亲身到过大量考察实地，搜集民间传说，把这个故事写得有声有色，并且否定了错误的说

法，作出了“夷门者，城之东门也”的正确解释。

在创作态度上，司马迁是严格按照历史事实来叙述人物、事件，从不隐瞒或歪曲任何事实；对历史上的人物作出恰当的评价，指出他们的功绩与缺点，就是对当时的皇帝汉武帝，司马迁也毫无顾忌地评价他的功劳与过失。他的秉笔直书的勇敢精神在当时真是难能可贵。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用他敏锐深邃的思想和独具匠心的手法，塑造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形式，使《史记》又成为我国古代文学的一部名著。他首创纪传体例，用这种表达方式，就可以把上下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作为背景，塑造了各种类型的完整人物形象，他们中有帝王、将相、刺客、娼优等，这些人物出生不同，经历不同，写法也不同，但却各自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表现了作者卓越的艺术才能。例如记述刘邦这个人时，写了他入关时与秦民约法三章，表现了他的政治才能；同时他还有另外的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有一次，韩信打了一个胜仗，占了大片土地，而刘邦正好吃了一个大败仗，企盼韩信来救他，但韩信却来信要求封他为假齐王（假者代理的意思），刘邦当时很生气，正想发作，张良在一旁暗示他，他马上顺着刚才的表情说：“大丈夫平定诸侯，就应该做真王，为什么要做假王呢？”这样短短的几句话，把刘邦的随机应变与玩弄权术的性格、手腕刻划得非常具体生动。

另外，司马迁对刘邦的死对头项羽的描写，更加精采生动，他抓住关于项羽的三个感人最深、流传最广的故事“破釜沉舟”、“鸿门宴”、“四面楚歌”，把项羽这位悲壮的英雄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首先，他写了“破釜沉舟”的故事。

在“钜鹿之战”这场决定性的战争中，项羽果断英明地指挥大军过河后，“破釜沉舟”，将所有的船只一齐沉掉，烧饭的锅子砸了，只带三天的干粮，这就具体地刻划了项羽要跟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结果项羽的军队一个顶十个，打败了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秦军，在推翻秦朝的战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战后招集各路将领更是威风十足。这段描写把项羽的叱咤风云、勇敢善战的英雄形象充分表现了出来。

“鸿门宴”的描写更是脍炙人口。司马迁充分运用高超的叙事手法，将项羽、刘邦两大阵营中的众多人物写得生动传神，将鸿门宴会中的紧张惊险的气氛表现得淋漓尽致。直到今天，每当我们阅读《史记·鸿门宴》时，都会情不自禁地为古人捏一把汗，《史记》的艺术感染力真是太大了。

从《史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他对秦末农民战争给予很高评价，他把农民起义的领导者、贫民出身的陈涉和诸侯同列，把“传”放在“世家”中，这对封建史学家来说，是很可贵的。更难得的是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夏、商的暴君桀和纣，残暴无道，商汤王和周武王便率领军队来推翻了他们；秦朝的统治者残暴无道，陈涉便领导人民起来反抗暴秦”。他不但把陈涉与有名的贤王商汤与周武相提并论，并且明确地表示，当君王暴虐无道的时候，人民的起义是完全应该和合理的。陈涉起义虽然失败了，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秦末农民大起义，残暴的秦朝土崩瓦解。司马迁在《史记》中完全肯定了陈涉起义的历史功绩，这比把农民起义污蔑为“盗”、“贼”、“逆”、“寇”不知前进了多少。

司马迁还歌颂了我国历史上许多英雄人物，他认为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对热爱祖国的蔺相如和廉颇的爱国行为也相当推崇，“完

壁归赵”、“将相和”的故事至今还被人们津津乐道；那些为反抗强暴、不惜牺牲性命的刺客以及救人危难、见义勇为的游侠，虽然他们被当时君子们所不齿，但司马迁却大胆地肯定他们，实际上就是同情劳动人民，支持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还有那些为人民作了贡献的人，如名医扁鹊、淳于意等，他们的医学理论和生动事迹也在《史记》中可以看到。

对于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他在歌颂汉代几个帝王的“文治武功”的同时，也写了他们的庸俗贪暴的一面，汉高祖的流氓相，汉文帝的“阴忍”，汉景帝的“刻薄”等他都作了无情揭露。他虽然是汉武帝的巨子，但对于他的过恶，也丝毫不加隐瞒，写汉武帝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两面作风；在《封禅书》里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求不死之药的荒诞无聊的行为一五一十地和盘托出；对汉武帝的黑暗统治加以揭露，如《酷吏列传》一共写了十个，而有九个人就是汉武帝的巨子，张汤是汉武帝所宠信重用的巨子，他和赵禹共同制订了种种残酷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作“腹诽之法”，就是不管是否有犯法的言语和行动，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怀不满，就可以依据这一条治罪，还有残酷迫害过司马迁的杜周也是其中之一，司马迁把这些人的罪恶活动记录下来，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些来暴露和控诉汉武帝时期的专制统治和残酷及黑暗。司马迁的这种“据事直书”的史笔即使当时一些对他有微词的人却也不得不承认“迁有良史之才”。以致惹得汉武帝很恼火，要把他的稿子烧掉。

《史记》的史学价值非常高，自从有了《史记》，中国才算有了完整而系统的正规史书。另外，《史记》在文学价值上也非常高，影响也很大。司马迁优美动人的文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文人骚客，从西汉开始，以后的许多文学家都从《史记》中吸取营养，像许多记载的事件成为后人小说、戏剧的题材，艺术手法特别是那简洁明练、通俗生动的语言也对后人影响很大。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对《史记》在史学上、文学上伟大成就的最有力的肯定。

清代大思想家顾炎武对《史记》的评价也相当高，他认为《史记》是把叙事与议论结合得完美无缺的典范。司马迁一般很少用抽象的干巴巴的评论来发表自己的看法，而是用史实来说话，用一个个具体生动而又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说话，这样就更能说明作者的观点，读者也更容易接受作者的观点。这正是司马迁的伟大之处。他把历史与文学、叙述与议论、人物与事件结合得这样完美，以至于影响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写作与文学创作。

《史记》不愧为一部伟大的书，司马迁不愧为一个伟大的人。

## 王莽变革

公元元年前后，由刘邦开创的西汉王朝已经由汉武帝时期极强盛的时代而开始走向衰落。

这时期，朝廷的赋税劳役日益加重，土地大量地被贵族、官僚、地主兼并，再加上连年自然灾害不断，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农民不断地破产流亡。因此，当时的社会呈现出这样的景象：一方面贵族官僚和大地主、大商贾“多畜奴婢，田宅无限”，他们拥有大量的家内奴婢，广占田地，规模越来越大，他们竞相奢侈挥霍社会财富，穷奢极欲，过着纸醉金迷、荒淫腐朽的寄生生活；另一方面，劳动人民缺衣少食，啼饥号寒，他们虽然终年辛勤劳作，日晒雨淋，胼手胝足，可是却仍旧摆脱不了死亡的威胁，他们总是衣不蔽体，食不饱腹，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甚至为了生存、生活，不得不忍痛卖儿卖女，流浪他乡。

为了生存，人民纷纷揭竿而起，奋起反抗，西汉王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摇摇欲坠。由于社会危机空前严重，因此，面对这种情况，统治阶级中有些人对西汉王朝的统治开始感到失望以至绝望，他们企图缓和已变得越来越尖锐的阶级矛盾，实行改良，以挽救整个封建统治行将为暴风骤雨般的农民起义所推翻的危机。

在这种背景下，王莽登上了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他夺取了西汉政权，建立了一个称为：“新”的王朝，并且实行了一系列企图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历史上把这一次变法称之为“王莽改制”。

但是事情的结果却出乎王莽意愿之外，这主要是由于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结果改革适得其反，事与愿违，不仅没有能缓和阶级矛盾，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而且更加重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灾难，促成了全国性的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成为一幕在中国历史上令人深思、发人深省的历史悲剧。

究其根源，我们应该看到，西汉帝国从其一开始就是符合新兴地主商人利益的封建政权。

汉初的70年间，西汉统治者实行了休养生息和奖励农业生产的政策，社会经济很快由恢复而发展到上升阶段。因此到汉武帝刘彻统治时期，在经济上，西汉农业生产有了显著的提高与进步，而商业资本也逐渐兴盛起来了。在政治上，西汉帝国的统一也由领主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交叉相错走上了单纯的郡县制轨道，这标志着西汉行政上的统一最终完成，西汉帝国也因此走上了空前强盛与富裕的封建王朝的顶巅。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就依靠这雄厚的经济基础，北击匈奴，西通西域，开辟了为后人高度评价的丝绸之路，使汉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繁荣昌盛的国家。

可是就在汉武帝建立起一个空前强大的封建帝国的同时，社会危机也日益暴露出来。因为连年不断的对外战争，使广大劳动人民被迫脱离生产，承担十分沉重的兵役，以致造成了水利失修，旱涝灾害频繁，农业生产日益呈现萎缩的趋势。同时也由于军费开支十分浩大，政府财政出现困难。更为严重的情况是，由于大地主、大商人对广大农民的残酷剥削与掠夺，贵族豪强对广大农民土地的不断兼并，使得广大农民被迫背井离乡，到处流亡。

从西汉成帝时开始，西汉王朝就已步上了崩溃的道路，到了汉哀帝、汉平帝统治时期，局势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汉成帝在西汉王朝的统治者之中，是一个极其荒淫腐化的封建帝王。他



十分喜欢游逛，特别嗜好饮酒，而且诸如斗鸡、走马、贪色之类更是趋之若鹜。他曾先后召赵飞燕姊妹进宫，供其日夜淫乐，并且还修建了一座据说是黄金、白玉、明珠、翡翠等装饰的昭仪宫以显示对其恩宠。此外，他还对五个帮助他从小戚手中夺回权力的宦官，同日封为诸侯王，当时人称之为“五侯”，对之宠信有加。这样就使西汉王朝的统治更加腐败与黑暗。

此外，严重的天灾不断袭击当时的广大农村，极大地摧毁了当时的农村自然经济，使农民大量地破产，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再加上当时社会政治腐败，贪污横行，横征暴敛，而且贵族、官僚们将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又用来大肆掠夺农民的土地。土地兼并的加剧，迫使广大农民流亡他乡，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与阻碍。

此外，曾长期积累起来的巨大的商业资本，一部分被商人们用于囤积居奇，垄断人民的生活资料，另一部分则转化高利贷资本，像潮水一样涌进农村，使农民们把仅有的一点土地、家产、房屋都作利息交了出来，直到最后把他们的子女甚至自己也当作奴婢提供出来，作为债务的偿还。此时，社会上的奴婢的主要来源已不再是战争的俘虏，而是由于年岁饥馑，或受高利贷商人的盘剥，或是仅有的土地为大地主所兼并而丧失生活资料不得不出卖自己为奴婢的小农。此外，还有因罪被没为奴隶的犯人。

总之，在土地兼并过程中，大商人成为大地主，而他们又收买原来的小农为奴婢。在这样的双重并吞下，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社会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了，阶级矛盾也日益尖锐化了。

由于贵族、官僚、地主、商人的压迫和剥削，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和工奴为了生存不得不奋起反抗。在日益发展的人民起义反抗斗争的打击下，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开始感到了严重的威胁。他们企图对土地兼并和奴婢、流民不断增加的趋势稍加抑制，以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

公元前7年，大司马师丹、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等人提出了一个限田、限奴婢的方案，它的内容是，官僚、贵族、地主占有土地不得超过30顷，过限的充公；商人不许占田做官，违者以律论处；诸侯王只能占有奴婢200人，列侯和公主为100人，官吏和富豪为30人。这个方案虽因受到当时掌权的外戚和宠臣的反对而夭折，但它却成为以后王莽变革的先声。

汉成帝死后，哀帝继位。哀帝之荒淫，比之成帝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特别宠爱一个变童叫董贤的，出则同乘一辆车，入则侍立左右。哀帝赏赐给他的钱总计达40多亿；并封他为大司马卫将军，甚至还想把帝位禅让给董贤，这真是荒唐到极点了。

哀帝之后，平帝嗣立，平帝当时只有9岁，自然无法掌权，这样，一个众说纷纭的“改革家”——王莽就进入了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

王莽，字巨君，他出身于一个贵族官僚的家庭。祖父王禁，生四女八男，其中一女名政君，为元帝皇后，王氏一家也因此关系而成了贵族。成帝继位后，尊母王政君为皇太后，拜大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给其他几个舅舅也都封了侯。外戚王家从此掌握了朝政大权。但是由于王莽的父亲王曼早死，是太后诸弟中唯一未被封侯的，所以王莽自幼家境贫寒，在政治上没有取得什么地位。他为了出人头地，一方面努力读书，把四书五经都读得滚瓜烂熟；另一方面则拼命巴结伯伯叔叔，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栽培。特别是对于担任大司马大将军的大伯王凤，王莽更是像孝敬自己的父亲那样孝敬他。王凤病重的时候，王莽为了献殷勤，求信任，亲尝汤药，端屎端尿，不嫌脏，不怕

累。为了服侍病人，他一连几个月没有梳头洗脸，睡觉不脱衣服。王凤被王莽的这种行为了感动了，临死以前，他向皇太后和汉成帝推荐王莽。这样，王莽才被任命为黄门侍郎，接着被提拔为射声校尉。从此王莽开始踏入仕途。

由于王莽善于巴结而获得了他的姑母和伯叔们的欢心，所以，其叔父王谭、王商以及当时名臣戴崇、金涉等人于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联名上书推荐，成帝下诏追封其父王曼为新都哀侯，王莽得以继承爵位，当了新都侯，并被任命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成为皇帝的亲近侍从。

又过了几年，他的叔叔、大司马骠骑将军王根年老退休，王莽就代替他做了大司马，掌握了朝政大权。

王莽是王家的第五个大司马，前四个均是他的伯伯叔叔。为了使自己的名声能够超过他们，王莽装出恭谨勤劳的样子，不知疲倦地工作。他还用心搜罗党羽，凡是来投奔他的，不论地方远近，出身贵贱，他都来者不拒，一概收用，让他们做官。为了收买天下人心，他还把从自己封邑里收来的钱和粮，都拿出来赠送给宾客，而他自己家里却过着十分俭朴艰苦的生活。据说有一次，王莽的母亲生病了，朝廷里文武百官都派自己的夫人去探望。当时王莽的妻子穿了一件刚刚能遮住膝盖的破衣服，出来迎接客人。那些贵夫人们起初都以为这一定是王莽家里低贱的佣人，后来一问才知道那就是大司马的夫人，她们都感到十分惊奇。这样，王莽舍己为人，克己奉公，勤俭朴素的名声就在朝廷内外传开了。朝廷里的大官都在皇帝面前称赞王莽，他的宾客，名士也都到处替他吹嘘。

但是，好景不长，王莽任大司马一职不到半年时间，成帝便一命呜呼。哀帝继位后，其祖母家丁氏和母家傅氏掌权，王莽受到排挤不得已被迫称病辞职，回到他的封国新都闭门闲居。

这时，他更想尽办法以博得社会上的称誉。

一次，他的第二个儿子王获杀死了一个奴婢。在当时，杀奴婢的人并不至于要偿命的。但王莽却深究王获不放，最后迫他自杀以谢罪。所以，王莽一时间获得很多人的同情与称赞，认为是一个“公正讲理”的人。因此，王莽在封国休闲三年，官吏和百姓自动上书替王莽申冤辨屈的数以千百计，他们都强烈要求让他出来管理朝政。

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哀帝病死。不学无术的董贤，连丧事调度都不会，而且在此之前，掌权的丁太后和傅太后都已相继死去，当时已72岁的太皇太后王政君便以王莽曾主持过成帝的丧事为由，亲自下令召王莽回京“佐”董贤调度丧事。王莽回京后，立即以太后名义掌握了军政大权，以防董贤和丁、傅外戚作乱。接着，罢免了董贤大司马之职，董贤被迫自杀。元后下诏命王莽重新担任大司马一职，并领尚书事。元后与王莽选择了年权9岁的中山王刘衍为帝，然后由太后临朝称制，委政于王莽。

王莽执掌朝政后，为彻底杜绝可能与王氏集团为敌的其他外戚集团的出现，首先废掉成帝的赵皇后和哀帝的傅皇后，并逼令二人自杀而死，丁、傅外戚中有官爵者一概罢免，家族成员或发回故里，或流徙边郡。其次，为防范平帝之母卫氏家庭对自己构成严重威胁，王莽仅以苦陘县作为卫氏的汤沐邑，而不准她及其亲属进京。

王莽在排除其他外戚威胁的同时，又大力铲除异己。在元后召王莽回朝视事后，满朝文武一致秉承元后旨意而推王莽为大司马，唯独前将军何武与后将军公孙禄持不同意见，二人互相推举。因此被王莽视为眼中钉，最后把

他们二人都罢免了官职。红阳侯王立是元后的亲弟弟，王莽害怕他在太后那里讲他的坏话，所以也罗织罪名，加以陷害，最后将其遣送回封国。

王莽把一批碍手碍脚的人挤走以后，就在朝廷中安插自己的亲信。王舜、王邑、甄丰、甄邯、平晏、刘歆、孙建、崔发、陈崇，还有甄丰的儿子甄寻、刘歆的儿子刘歆，都是王莽的心腹、谋士、爪牙，王莽都让他们作了大官。王莽有什么意图，就授意他们出面向太皇太后去奏请。王莽自己在太皇太后下诏以后，则装出恭敬从命的样子去执行，用来迷惑太皇太后。王莽就用这种办法，让王舜他们出面，要求太皇太后封他为安汉公。太皇太后同意了这个要求，王莽却又上书说，孔光、王舜、甄丰、甄邯他们都有很大的功劳，应当封赏他们，而不应当封我。甄邯赶忙又再向太皇太后上书请封王莽，王莽又再三推辞，并且因此装病不上朝。太皇太后封赏了孔光等四人之后，王莽还继续推辞，大臣们又一次上书给他请封，太皇太后又再一次下了封赏的诏书，王莽这才勉强接受了安汉公的封号。封号虽然接受了，但是给他增加的封地他却坚决不肯接受。甄丰等人见他不肯接受封地，就鼓动各地的官吏和地主出来拍马屁，上书称颂王莽这种不受封地的“功德”。几天当中，这些拍马屁的人，竟然又骗取了40多万人具书上奏，替王莽歌功颂德，他们用尽了四书五经里的好话来歌颂王莽。

王莽不肯受田的事情传出去以后，一些要求限制名田的中小地主和农民都来拥护他，为他的“修养”所动容，甚至传说王莽辞田之事，竟感动得蜀郡男子路建等人撤消了争田的诉讼，因此当时有些阿谀奉承者就说，王莽的道德比周文王还要高尚。

为了控制宫闱，王莽又发动亲信，假借民意，请求立他的女儿为平帝后。为此，平民、儒生、郎官等守候在宫门前为之请愿的每天竟达1000多人。他们声称，“明诏圣德巍巍如彼，安汉公盛勋堂堂若此。今当立后，愿得公女为天下母”。意思是说，圣上圣德浩荡，如高山之崔巍，而安汉公王莽功勋巨大无量，因此，天下的老百姓都希望策立安汉公之女为皇后，为天下母仪。这样，王太后迫于“民意”，只好答应他们的请求。因此，王太后下诏命人将“黄金2万斤，钱2万万”作为聘礼抬到王莽府中，王莽只接受了4000万，并把其中的3300万钱分发给陪嫁的人。

由于王莽的女儿嫁给汉平帝作了皇后，这样他又多了“国丈”这一皇亲贵戚的身份，地位也就更加显赫了。有个乐陵侯刘庆，见王莽势大，也来拍马屁，他给太皇太后上书说：“周成王小时候，由周公旦代行皇帝的职权，如今皇帝也很年轻，应当请安汉公代行皇帝的职权”。太皇太后把刘庆的这个建议交给大臣们去商议。大臣们都说：“应当照刘庆的话办”。于是太皇太后就叫王莽像周公旦辅佐周成王那样，毫不客气地代行起皇帝的职权来了。

王莽的地位一天天提高了。汉平帝的年龄也一天天长大了。汉平帝看出王莽的野心不小，内心又是害怕，又是怨恨。平帝对王莽来说终究是障碍，因此就在元始五年（公元5年）十二月的一天，用毒酒药死了汉平帝，然后又找了一个两岁的小孩刘婴来做皇太子，历史上称他为孺子婴。

汉平帝被毒死后，据说武功地方有个叫孟通的人，淘井淘出了一块白色的石头，上圆下方，石上刻有“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八个大字，这自然又是王莽手下那帮人弄了太皇太后。太皇太后没有办法，只好又封王莽为摄政，并且把第二年的年号也改为居摄元年（公元6年）。

摄政皇帝虽然做了，但对王莽来说毕竟还是假的。王莽便于公元8年12月逼迫孺子婴“禅位”给他。这样，王莽最终如愿以偿，登上了皇帝的宝座。王莽把朝代改名为“新”，这个新朝在中国历史上只是一个昙花一现的最短命的王朝。

等到王莽作皇帝时，社会危机相当严重，天下已处于行将陷于崩溃决裂的边缘了。统治阶级迫切需要对社会现状进行改革，以缓和阶级矛盾，挽救封建统治的行将瓦解的社会危机。王莽的所作所为，在各阶层中已有广泛的反响，从而他也就被地主阶级认为是执行这一任务，完成这一使命的最理想的人选。因此，他们对王莽的旨在扩大和巩固自己势力的政事都加以默认和支持，而农民则希望能有个给他们改善生存条件的皇帝，中小地主也希望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得到保护，不至于在豪强的兼并下破产，所以他们对王莽的改朝换代，改制变革都寄予了期望和支持。

王莽也意识到了天下之所以大乱，主要是因为土地兼并而导致大量农民破产流亡，政府租税枯竭引起国家财政收入锐减，这已经不是靠减租、免税、救灾、恤贫等一些小恩小惠所能奏效的；而必须将当时矛盾百出，弊病丛生的社会经济制度加以变革，才能挽救封建统治的深刻危机，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

王莽建立“新朝”，做了真命天子后，就开始着手进行系列的社会变革。公元9年4月，他提出实行王田制度和奴婢政策。

他在诏书中说，秦朝统治残暴，对人民征收很重的赋税来供统治阶级任意挥霍，大量地征发老百姓去修建宫殿、陵墓，从而使无数的劳力脱离了农业生产，就是破坏了上古圣人为我们确立的正确制度。自从秦朝废除井田制度后，由此引起了土地的兼并与掠夺，豪强占有的田地以千万计，而贫穷的人却没有立足之地，不仅如此，而且又设置奴婢买卖的市场，把他们看作牛马一样，可以进行自由买卖，这样就使奸诈凶险之徒为利益所驱动，以至于铤而走险，掠卖别人的妻子儿女，这就违背了上天爱民的本心，也有违于人间最一般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

王莽鉴于此种情况，接着就下令将所有田地都收归国有，称“王田”。然后又规定，男丁8口之家，占有田地900亩，凡是占有的田地超过个标准的，超出的部分一律要分给他的宗族其他成员以及乡亲和朋友。没有田地的，可以根据这个新规定占有田地。奴婢则一律改为“私属”，不得再到市场上进行买卖。对于那些胆敢诋毁这项制度淆乱民心的人，一律处以充军边疆。

可是，当时全国的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王莽要想把他们吞并的土地再吐出来，无异于“猴腮里抢栗”，这显然是一件很不容易，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即使王莽用尽百般手段，并以种种刑罚对付那些不实行这项新制度的人，其结果仍然收效甚微。因为，执行王田制度的官吏他们本身就是中小地主，他们当然也不会心甘情愿地退出多占的田地，所以他们就在这项法令的执行过程中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这个制度也就根本不可能真正地得到执行。

当时，有一个商人地主的代表区博就曾公开对这项新制度进行了指责，他说：“井田制度虽然为圣人所制定，但是它已经被废除很久了。周朝衰落后，人民都不愿意在周朝统治下继续生活下去，可是秦朝能够顺应民心，因此废除井田制而实行土地私有，秦也因此能够消灭六国而统一中国。一直到现在，天下都生活得很好，大家相安无事。现在又要恢复井田制，这是违民

心之举，即使尧舜复生，也是无能为力。现在陛下刚刚登基，天下人心刚刚安定下来。希望这项制度暂时不要匆忙实行”。这就说明地主、官僚们都不肯交出田地，并威胁王莽，说这是违背民心的，如果一意孤行，你的皇帝位子也就坐不稳了。他们既然都不交田，农民也就无田可受，他们原来的希望也就化为乌有，逐渐地对王莽政权产生了不满情绪。

王莽对于奴婢问题，既规定奴婢为主人的“私属”，却又禁止他们进行自由买卖，这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更何况只是用禁止奴婢买卖，而不是用释放奴婢为平民的方式来解决，也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事实上奴婢买卖仍在暗地里盛行，王莽也曾把获罪的数十万人没为奴婢。因此，人民的境况不但没有得到丝毫改善，反而更为悲惨。

王莽的王田制度和奴婢“私属”因遭到地主阶级的普遍反对而无法实行下去，最后不得不草草收场了事。公元12年他就下诏正式废除了这项新制度，完全恢复到改革以前的状态中去了。

除了实行王田制度外，在经济方面，王莽实行的另一项变革措施就是实行“五均”、“赊贷”与“六莞”。

王莽在公元10年，为了救济天下老百姓，抑止豪强的兼并，下令实行“赊贷”、“五均”的新政策。

“五均”，就是由政府出面组织工商业的经营生产并对全国的物价进行管理，其具体办法是：在长安、洛阳等五个城市，设立五均官。长安分东、西市，设令，各市有市长，令和长皆兼五均司市；各城市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工业商业各行业，都要按其经营方向与品种向司市申报，钱府丞则按季度向他们收取工商税，各司市在各个季节的中间那一个月评定物价，规定好法定价格，如果市场价格超过了官定价格，政府就以官价强行收购货物，然后再以官价卖给老百姓。如果市场价格低于官价，则让人民自由买卖。同时，对于老百姓卖不出去的粮食、布匹、丝绸、棉絮等，经过五均司市官考核以后，按本价收购，不让老百姓蚀本。

赊贷就是由政府出面组织办理贷款方法。其具体方法是：如果因为祭祀祖先，办理丧事没有钱，老百姓可以向当地政府申请给以贷款。这种贷款不取利息，期限分别为10天和3个月时间；如果因为从事农业生产缺少资金而需要贷款的，也可向当地政府赊贷。它的年收利息不得超过10%，最低也不过3%。

六莞，指的是由政府官卖和管理的六种经济事业，即盐、酒、钱由政府专卖；铜冶钱布，官家铸造；名山大泽，官家管理；五均赊贷，政府承办，这些合称为六莞。

就理论和意义上说，五均和赊贷是应打击商人之囤积居奇的，从而有利于老百姓。可是王莽的政权基石是地主阶级，这就决定了其为大地主、大商人服务的本质。因此这些措施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不屑于王莽集团的另外一些地主、官僚和高利贷者，但政府作为支撑王莽政权的地主阶级的集中代表，却又对人民进行了集中的剥削。因为王莽政府通过由政府出面组织和管理各个行业，进而操纵物价和收取利息，加上当时政府不断改变货币政策，五均官对人民又大肆巧取豪夺，人民所受的剥削也就更加沉重了。更何况六莞中对山林川泽的管制和封禁，更使广大农民连从山林里、从水泽中获取一些维持生计之物的机会也被剥夺了。而且当时政府派去执行六莞的均是富商大贾，他们就更加肆无忌惮了。这些商人以政府作后台，与地方官吏互相勾

结，狼狈为奸，利用平价政策，用低价收购老百姓生产的東西，然后到适当时机又用高价卖给老百姓。据说当时的物价飞涨，米豆等粮食二千钱一升，一斤黄金只能买五升豆子。因此这项政策也就必然引起全国人民的普遍反对，于是在公元 22 年，王莽派人下去巡行全国，宣布废除这项措施。

除了以上两项经济政策外，王莽又先后五次进行了货币的改革。

西汉王朝自从武帝时开始，一直通行的五铢钱。王莽当政以后，认为钱币必须有主辅多种。

公元 7 年，王莽第一次对货币制度进行改革。他下令改铸钱币，在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五铢钱以外，又加铸了错刀、契刀、大钱三种货币。这些新币的质量，远远少于钱面所定之值，因此，民间大量地私自铸造，这种现象政府屡禁不绝。王莽政府铸大钱来套取五铢钱，让百姓交出黄金兑换，却又不给他们应得的兑换值。因此，这完全是对老百姓一种变相的掠夺。在这之后，王莽又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每一次都是以小易大，以轻换重，从而对人民都是一次新的搜刮，也使物价猛涨，通货膨胀十分严重，结果是贫穷的人根本无法生存下去，富有的人的财富也无法继续保持不减少。

以上是王莽进行的经济改革。在经济改革的同时，王莽还进行了政治上的变革。

公元 12 年，王莽下诏，将全国划分为九个州，共 1800 个封国和相同数目的附庸国。全国受封的公侯伯子男人数为 796 人，附庸国国君 1551 人，以后又以丰收的等级作为他们俸禄增减的标准。但是丰收的等级无法精确地加以确定，而官制又非常繁琐，因此有些官吏始终领不到政府的工资，他们只好利用各自的权力收取贿赂，从而使吏治败坏到了极点。除此以外，王莽又将西汉原有的 103 郡增加为 125 郡，县扩大为 2203 个，又更改了全国 70 多个郡的名称和一大半县的县名，有的郡名竟一年改了五次，最后却又仍旧改为原来的名称，这样就使官吏百姓们无法记住，因而皇帝在下诏书时，不得不在新名之下，又加上原来的旧名。

王莽时期的变革，很少有能够顺利执行的。大半都是半途而废。但也有例外，下面二项措施就是一直实行并在后代也保持了其精神与思想风貌。

一是修改了汉朝的度量衡制度。我国的度量衡制度，在秦时作了统一的改革，这时到王莽时期，又作了进一步的改革，这种经王莽改革过的度量衡制一直流行于后代。

二是王莽政府还规定：地主不耕种田地，任凭土地荒芜，要处罚三个人差役的赋税。城市中的民宅，不种树的，要处罚三个人缴纳的布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要处罚一匹布。这尽管是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出发而制定的，可是从当时的具体的历史条件，社会实际情况来看，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王莽在进行政治、经济变革的同时，又大兴土木。他在长安城占地万亩，大修王家九庙。

同时，王莽还派官吏 45 人，分行天下，博采乡里淑女，选 120 名，送进宫中，以供其淫乐。

为了转移人民的不满，王莽还穷兵黩武，大派使节和军队分赴四边的少数民族，去宣示新王莽王朝的国威。这就引起了旷日持久、损耗巨大的对匈奴的战争。

王莽统治时期，正好是西汉的末期，当时社会各种矛盾都已日益暴露出

来并且日益尖锐起来，封建统治阶级正面临着一场深重的危机。当时许多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都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希望进行一场变革来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这时，王莽作为一位政治改革家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王莽建立新朝后，即着手进行了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个人的阶级局限性，以及改革的走样及其执行不力，最后致使变革流产。王莽变革不仅遭到了大地主、大商人的普遍反对，而且由于改革的措施实行中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与掠夺，因而也遭到了广大农民的反。最后改革终遭失败，王莽统治晚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先后在东方、南方爆发，由于改革的失当以及王莽晚年的荒淫腐化，再加上对匈奴的战争，使王莽政府最后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瓦解了。因农民起义而起的刘氏宗室刘秀最后在中原的争战中打败其竞争对手，统一了全国。建立了东汉王朝，鉴于西汉特别是王莽时期的经验教训，刘秀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政策，使一个新的王朝开始了一个新的历程。

## 东汉光武中兴

公元8年，外戚王莽篡夺了西汉政权，建立了“新”朝。

王莽是个政治才能很一般的人，但他却想成为尧舜禹那样的伟大帝王。当上皇帝不久，他就宣布进行改革。但是由于他的能力有限，加上国内从上到下的人民都不拥护他，所以他的改革很快就失败了。从此以后，王莽干脆破罐子破摔，只顾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根本不顾全国人民的死活。结果整个国家让他搞得乱七八糟，大大小小的官吏贪污腐败成风，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苦。人们为了寻求活路，终于揭竿而起，拿起刀枪，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来推翻王莽的腐败统治。

王莽天凤四年（公元17年），琅玕郡海曲县（今山东省日照县）发生了一起县官胡乱杀人的事件，因此引起了一场农民起义。事情是这样的，海曲县县衙门有个差役名叫吕育，他犯了点小错误，就被县官处死了。吕育的母亲为了给儿子报仇，联合逃荒的农民几千人发动武装起义，一举攻进县城，杀死了县官。附近农民听到起义的消息，纷纷赶来参加，起义军很快扩大到一万多人。这次起义历史上称为吕母起义，它揭开了农民起义的序幕。

和吕母起义同一年，南方的荆州（今湖北、湖南一带）也发生了农民起义。新市（今湖北省京山县）人王匡、王凤，趁着饥饿的农民为争抢野荸荠发生殴斗的机会，进行鼓动，号召人们起来反对地主恶霸和王莽政权。王匡、王凤的起义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公元17年，南方荆州天灾不断，庄稼颗粒不收，老百姓没有饭吃，只好到野地里以及沼泽地带去挖野荸荠来充饥，由于人多野菜少，不久就发生了冲突。王匡、王凤平时就很有威望，他们俩站起来为大家调解，说：“咱们都是贫苦人，之所以发生争吵，是因为王莽的新朝太腐败，害得咱们吃不饱穿不暖，但是，我们不能就这么忍饥挨饿下去，应该联合起来，组织成强大的军队，打到洛阳去，推翻王莽政权，然后咱们才能过上好日子。”

王匡、王凤讲完之后，大家一下子停止了争吵，一致推举他们俩为首领，带着他们与新朝开战。

王匡、王凤把这些饥民组织起来起义，立即就聚集了好几百人。另外，还有一些逃亡的犯人也来投奔他们。

王匡他们占领了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当成他们的根据地，攻占附近的乡村。仅仅几个月工夫，这支起义军发展到七八千人。

王莽派了两万官兵去围剿绿林军，被绿林军打得大败而逃。绿林军趁势打下几座县城，打开监狱，放出囚犯，把官府粮仓里的粮食，小部分分给当地穷人，大部分搬到绿林山。投奔绿林山的农民越来越多，起义军增加到五万多。没想到第二年，绿林山上发生了疫病，五万人差不多死了一半。还有一半只好离开绿林山，后来分作三路人马——新市兵、平林兵和下江兵。（平林在今湖北随县，下江在今湖北西部）这三支起义军互不统帅，各自为战，分别占领一块地盘与王莽军队抗争，在不断的大小战斗中，队伍都迅速壮大起来。

王匡、王凤起义的第二年，山东境内也出现了大的灾害。那个为儿子报仇而起兵的吕母的家乡琅玕郡有个叫樊崇的英雄也在山东莒县领导农民起义。原来吕母的部下都投奔到樊崇的军营里来，不到一年的工夫，队伍就已经发展到一万多人。樊崇带领起义军打到泰山郡（今山东省泰安市），当时



青州、徐州一带闹饥荒，饥民纷纷起来参加，起义军不久就发展成一支拥有十几万人的队伍。樊崇是个朴朴实实的农民，没有念过书。他起义的目的，只想推翻王莽，让人们能够活得下去。他领导的起义军战士把眉毛涂成红色作为标记，因此叫赤眉军。赤眉军保持着贫苦农民的淳朴作风，领导人只采用一些小官吏的称呼，樊崇自称“三老”，下面小一些的领袖称为“从事”、“卒史”，士兵们则互相称“巨人”。樊崇不识字，他没有制订什么法律和规章制度，只在口头上规定：杀人的要处死刑，伤害人的要赔偿损失。要求起义军人人遵守这个规定。

樊崇的起义军很讲纪律，所以，百姓都拥护他们。

公元 22 年，王莽派太师王匡（和绿林军中的王匡是两个人）和将军廉丹率领 10 万大军去镇压樊崇的赤眉起义军。樊崇作好准备，跟官兵大战。

赤眉军战士作战非常勇敢，他们个个以一挡十，而官兵则士气低落。结果，王莽的军队被打得七零八落，连战死的加上逃亡的，占去了一大半。主帅太师王匡（这个王匡和绿林军领袖王匡不是一个人）的大腿被起义军砍伤了，幸亏他跑得快，没被起义军打死，而将军廉丹却在乱军中被剁成了肉泥。

经过这一仗，起义军发展得更快了，不久，赤眉军就发展到了十多万人。

绿林、赤眉两支起义军分别在南方和东方打败王莽军的消息一传开，其他地方的农民也都活跃起来。黄河两岸的大平原上大小起义军有几十路。一批没落的贵族和地主、豪强也趁机起兵，反对王莽。

南阳郡舂陵（今湖南宁远北）乡的豪强刘縯、刘秀兄弟二人，因为王莽废除汉朝宗室的封号，不许刘姓人做官，心里怨恨，发动族人和宾客七八千人在舂陵乡起兵。他们和绿林军三路人马联合起来，接连打败了几名王莽的大将，声势就强大起来了。刘秀的军队号称舂陵军。

绿林军的几支队伍没有统一的指挥，所以将士们认为人马多了，应该有个首领，才能统一号令。当时一些贵族地主出身的将军，利用当时有些人的正统观念，一定要找一个姓刘的人当首领，认为这样才能符合人心。

正好这时候有人找到一位自称是汉朝宗室的人，叫刘玄。绿林军的将领们大都出身草莽，没有多少政治斗争经验，商量了一阵子大家便都同意立刘玄为皇帝。

公元 23 年，绿林军各路将士就正式立刘玄做皇帝，恢复汉朝国号，年号“更始”，所以刘玄又称更始帝。更始帝拜王匡、王凤为上公，刘縯为大司徒，刘秀为大常偏将军，其他将领也各有各的封号。绿林军到这时才显得比较有组织性。

打那时候起，绿林军又称为汉军。

刘玄即位之后，派大将军王凤、王常和刘秀带兵攻打昆阳。他们作战勇敢，很快就拿下了昆阳。接着刘玄又派他们攻占了附近的两个重镇鄧城和定陵（两地都在今河南鄧城县）。

刘秀是南阳的一个大地主，也是西汉王朝的一支关系较远的宗室。刘秀这个人虽然很聪明，但他出身富裕的大地主家庭，从小就没有大志，眼光也很短浅。他年轻时曾去新野（今属河南），听说当地有个美女叫阴丽华。后来到了长安，看见执金吾（九卿之一，负责首都治安）随从警卫特多，威风十足。就很感慨地说：“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作为一个世家豪族子弟，他同他的先祖、贫困的乡里小吏，后来当了汉高祖的刘邦比起来，志趣相差就太远了。但是，自从他同哥哥一道参加绿林军之后，由于人

很聪明，而且作战勇敢，竟一步步地往上爬，到后来，干脆当上了皇帝。这是后话。咱们再回来讲他与王莽军队作战的经历。

王莽听到绿林起义军立刘玄为皇帝，已经坐立不安，如今连失了几座城池，更是着急，马上派大将王寻、王邑率领兵马 43 万，从洛阳出发，直奔昆阳。

为了给士兵们壮胆，王莽军不知从哪儿物色了一个巨人，名叫巨毋霸，巨毋霸长得个子非常高，身子又像牛那样粗大。他还有一个本领，能够驯养一批老虎、豹、犀牛、大象。王莽派他为校尉，让他带了一批猛兽上阵助威。

当时，驻守在昆阳的汉军只有八九千人。有的将领在昆阳城上望见王莽的军队人马众多，怕打不过他们，主张放弃昆阳，回到原来的据点去。

刘秀对大家说：“现在我们兵马和粮草都相当缺少，全靠大家同心协力打击敌人；如果大家不愿抵抗，昆阳一失守，汉军各部也马上就被消灭，那就什么都完了。”

大家觉得刘秀说得有道理，但是又觉得王莽军兵力强大，必须用计谋智守昆阳，绝不能与王莽的军队硬拚。

不久，侦探回来报告：王莽的新朝军队已经到了昆阳城北，队伍有几十里路长，只见一路上烟尘滚滚，旌旗蔽天，望不见队伍的尾巴，声势非常大。

这时候，起义军领袖王凤、王常和刘秀等人商量，决定由王凤、王常全力守卫昆阳，派刘秀和宗佻、李轶等 13 人，黑夜里骑着快马从南门冲出去，到附近地区去征集援军。

当天晚上，刘秀带着 12 个勇士，披挂整齐之后，一个个跃上战马，挥舞着利剑，像闪电一样冲出昆阳南门。这时候，王莽的军队已经完全集结在昆阳城下，总共有十几万人马在那儿安营扎寨。他们正商量怎样早点把这个小小的昆阳城一举拿下的时候，突然，看到有人从城里冲出来。想到可能是去求援的，就赶快过来拦截。刘秀、宗佻、李轶等人奋勇作战，杀退了一批又一批敌人，终于冲了出去，分头到了酈城和定陵。他们把两地的几千农民起义军统一组织了起来。由刘秀率领着去援救昆阳。这些人个个都很勇敢，是真正的敢死队。

当时昆阳城外边，王邑、王寻的新朝军队已经团团围住了昆阳城。王莽的纳言将军严尤给王邑提出建议，他说：“昆阳城虽然小，但是很坚固，轻易不能攻破，绿林军的更始皇帝刘玄在宛城一带，我们应当用主力去打他，只要把他打败了，昆阳就可以不攻自破。”王邑不接受严尤的意见，一定要先打昆阳。他把 42 万大军全都压向昆阳，把小小的昆阳城围了几十重。只见昆阳城外旌旗蔽野，尘埃遮天，军号军鼓的声音几十里以外都能听到。王邑、王寻还调来了攻城用的云车、撞车和楼车。云车居高临下，能够把城里的情况侦察得一清二楚。撞车能够用来冲击城墙。楼车是弓箭手用来向城里射箭的战车。王莽的新朝军队，几乎把一切精良的武器装备全都用上了。他们还派遣了一部分士兵，专门挖掘地道，想从地道打进城去。

王凤、王常指挥昆阳城里的汉军，紧闭城门，守住险要的地方。城外敌人射来的箭，像雨点一般倾泻到城里，守城的士兵选好地形，隐蔽自己，坚守住自己的岗位，王莽的新军接近城墙，想要爬城的时候，城上的滚石擂木像冰雹似地打将下去，打得他们头破血流，抱头鼠窜。

昆阳城里的汉军这样艰苦奋战，死守了一个多月，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到六月里，刘秀率领的援军终于赶到了。他们在离开新军大本营

四五里的地方扎下营寨，刘秀亲自带着精兵，从背后攻打新军。王邑、王寻听说刘秀只调来几千援军，用轻蔑的口气对部下说：“刘秀只搬来几千援军，这不是拿鸡蛋来碰石头吗？”他们下令派出几千兵马去对付刘秀的援军，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失败。

总攻开始了，城内的守军坚持了这么长时间，早就想冲出去与王莽军队拚一拚了；他们越战越勇，奋不顾身，个个都能抵得上敌人的十个、一百个。

按照作战计划，刘秀带着三千名援军从敌人背后打过去，这样前后夹击，会取得更大的战果。刘秀的这三千人都是敢死队员，刘秀更是一马当先冲向敌阵。士兵们见主将这样勇猛，也都纷纷拿起刀枪，呐喊着冲杀过去。王邑、王寻率领的新军，没有料想到汉军这样厉害，一下子他们的阵脚被冲乱了，后退了好几里才站住脚跟。这一仗，刘秀的汉军消灭新军一千多人。以后几天，刘秀选择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继续进攻，又消灭了许多敌人。

这时候，宛城已经被起义军攻了下来，刘秀派人假装成从宛城来的使者，向昆阳城里送信，信上说进攻宛城的汉军已经取得胜利，马上就要乘胜开来支援昆阳。这个送信的假使者故意把信丢在路上，让敌人捡走。捡到书信的人拿去报告，王邑、王寻看后大吃一惊，他们认为，如果攻打宛城的汉军增援到昆阳来，自己这方取胜的希望更少了，原来那种趾高气扬的狂妄劲头已经下去了一半。

但是王寻仍然依仗自己军队数量多而认为可以打败起义军。他亲自带领一万精锐部队主动找刘秀交战。战斗一开始，王寻采用大兵压境的战术一古脑儿地往前冲，刘秀让自己的敢死队员暂时退却，等王寻的军队冲得没了劲头，刘秀突然带领三千勇士杀回来；王寻的军队一下子乱了套，个个拚命往回跑，只恨爹妈给自己少生了两条腿。而汉兵却越打越有劲儿，大家看准王寻，围上去乱砍乱杀，结果了王寻的性命。

刘秀带领援军继续冲杀，王寻的军队像洪水一样地往后溃退。

昆阳城里的汉军王凤、王常，一见外面的援军打了胜仗，就打开城门冲了出去，两下里内外夹攻，喊杀的声音震天动地。王莽军全都慌了神，乱奔乱逃，自相践踏，沿路 100 多里，丢下大批王莽军的尸首。

这时候，天空突然暗了下来，接着狂风呼啸，大雨像倾盆一样的直倒下来。巨毋霸带来助威的猛兽，也吓得直打哆嗦，不但不往前冲，反而往后面乱窜。汉军一股劲儿往前追杀，王莽军好像决了口子的大水一样逃奔，兵士掉在水里淹死的成千上万把湍水也堵塞了。士兵流出的血，把大地都染红了。

当王莽军大将王邑逃回洛阳的时候，43 万大军只剩下几千人。王莽的势力在这一战斗中差不多损失净光了。

汉军打扫战场，战场上到处都是王莽军丢下的兵器、军车、粮草。汉军搬了一个多月，都没有搬完，最后放了把火，把剩下的烧了。

昆阳大战消灭了王莽的主力的消息，鼓舞了各地人民，很快，各地农民起义像火山一样地到处爆发了，这些刚刚起来反抗的军队纷纷投奔那些早已经非常强大的起义军中，绿林、赤眉两支军队不但在数量上发展壮大，而且越来越得到全国老百姓的拥护。

昆阳大战之中，绿林军加上刘秀原来的援军，总共才一万多军队，却凭着聪明和勇敢，一举打败了王莽的 43 万军队。这充分显示了以刘秀为主的起义军领袖的出色军事指挥才能，昆阳大战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之一。

昆阳大战以后，更始皇帝刘玄派农民军领袖王匡攻打洛阳，派另一支军队攻打长安。因为王莽新军的主力在昆阳大战中已经崩溃，所以攻打长安的这支汉军很快就打到长安城下，他们从东北方的宣平门攻入城内，长安城内的市民在少年朱弟、张鱼的号召下起义，跟汉军一同围攻王莽的宫殿。攻破宫殿大门之后，一名起义士兵杀死了王莽。起义军战士出于对王莽的仇恨，一块块地分割了王莽的尸体。篡夺了西汉天下的王莽，在维持了15年的统治之后终于被推翻了。

刘秀和绿林军联合作战，在昆阳大战中打败了王莽的主力部队，立了大功。他的哥哥刘縯打下了宛城。已经被拥立为更始皇帝的刘玄，不费力气，坐享胜利果实，进驻宛城，拿宛城做了更始政权的临时首都。

刘玄在宛城当了几天皇帝之后，觉得自己的皇位不太巩固。他最怕的就是在昆阳大战中立了大功的刘秀和他哥哥刘縯。后来，刘玄找了个借口把刘縯杀掉了，准备以后再找机会除掉刘秀。

刘秀一听到他哥哥被杀，自己知道力量敌不过更始帝，就立刻赶到宛城（今河南南阳市），向更始帝赔不是。有人问起他昆阳大战的情形，他也一点不居功，说全是将士们的功劳。他也不敢给他哥哥戴孝，照常吃饭喝酒，有说有笑，一点也不流露出他忧伤的心情，可是一到晚上，他关起门来，躲在被窝里偷偷哭泣，发誓要为哥哥报仇。刘玄只看到刘秀的表面活动，看不出刘秀的内心所想，为了安抚和笼络刘秀，他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封为武信侯；但是并没有付给实际的权力。

更始帝以为刘秀不记仇，慢慢也就把刘秀放过了。后来，长安城被攻下来，更始帝迁都到洛阳，派刘秀去整修洛阳的宫殿，刘秀非常认真地完成了任务。更始帝很满意。迁进洛阳的宫殿之后，刘玄一下子被豪华奢侈的宫廷生活迷恋住了，不再过多地考虑其他事情。正好这时候河北各地有人发动骚乱，刘秀请求带兵去招抚，刘玄不加思索，手一挥，让刘秀带领很少的一点军队出发去河北了。

这时候，各地的豪强大族有了武器，有的自称将军，有的自称为王，也有自称皇帝的，各据一方。更始帝派刘秀到河北去，正好让刘秀得到一个扩大势力的机会，就好像是放虎归山。他废除王莽时期的一些苛刻法令，释放一些囚犯，一面消灭了一些割据势力，一面镇压河北各路农民起义军。整个河北差不多全给刘秀占领了。这样刘秀的势力在河北逐渐壮大起来，并且站稳了脚跟。

更始皇帝刘玄怕刘秀的势力继续扩大，想用计谋削弱他的力量，赶快派人去封刘秀为萧王，并且召他回首都长安来商量国家大事（这时候刘玄已经迁都长安）。刘秀既然已经有了自己的地盘，当然不愿意再受刘玄的控制。他叫人给刘玄带去一封信，信上说：“黄河以北还没有完全平定，我不能回长安去”。刘秀跟刘玄实际上已经决裂了。

接着，刘秀对分散在冀州、兖州一带（今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地区）的农民起义军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他打败了力量比较强的铜马、青犊等农民军。用诱降的手段收编了一些零散的农民军，把黄河以北的广大土地全都攫取到了自己手里。接着，他又乘赤眉军出兵西进的机会，派人两路出兵，扩充自己的势力，一路从河北南下，夺取了原先赤眉军的地盘；一路向西进军，攻占并州（今山西中部）。刘秀经过这几次战斗之后，已经控制了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

这时，樊崇的赤眉军已经一路西进，与王匡的绿林军汇合。

王匡原来一直拥护更始帝刘玄，但是刘玄这个人疑心太重，他老觉得自己没有军功，而绿林军的几位高级将领却个个身经百战，功勋卓著，将来他们会不听从他的指挥。于是他用计连续杀了好几位绿林军首领，公开与绿林军搞分裂，王匡只好逃出长安城与赤眉军汇合。

樊崇、王匡两军汇合以后，军队更有攻击力了。很快他们就打进了长安，推翻了不得人心的刘玄统治。赤眉军进入长安的时候，长安城里的老百姓对他们很拥护，扶老携幼、成群结队地到街上来欢迎。可是长安附近的地主却把粮食偷偷地藏起来，想要用饥饿来困死农民军。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刘秀，就乘着这样的时机，派大将邓禹一路打来。赤眉军虽然多次打败过邓禹，可这一回由于缺乏粮食，不能坚持抵抗，樊崇只好下令放弃长安，准备往东打回山东老家去。一路上，他们遭到了刘秀军队的伏击，损失极大，归路断绝了，只好被迫投降。樊崇投降后想要恢复起义军的势力，被刘秀发觉后给杀害了。

刘秀派军队乘胜进入长安城之后，他手下的将领们准备拥立刘秀做皇帝。这些将领们有自己的打算，他们知道，一旦能够拥立刘秀称帝。他们就能当个开国功臣。他们对刘秀说：“如今天下没有君主，大王是高祖九世之孙，众望所归，希望您趁早即位称帝，安定民心”。刘秀听了大将们的话，怕时机还不成熟，就假装推辞，意思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向他劝进。

大将们看出了刘秀的心思，发动更多的人联名给刘秀上书，劝刘秀即位称帝。大将耿纯代表大家说出了心里话，他对刘秀说：“天下的英雄，离别亲属，抛弃田园，跟着您在枪林箭雨中出生入死，所希望的无非是想能够做个开国元勋罢了。希望您赶快即位称帝吧！”

这样，刘秀就不再推辞了。他开始计划称帝的一些具体事宜。公元 25 年，刘秀在行军途中，走到高城（今河北高邑）附近，即皇帝位，改元为建武元年，不久又称为光武元年，接受百官将领的朝贺。这年十月，进入洛阳，并定洛阳为首都、国号仍然为汉。因为刘秀的首都在东边。历史上称刘邦建的汉朝为西汉，刘秀重建的汉朝为东汉。刘秀就是东汉光武皇帝。

刘秀镇压了赤眉起义军以后，虽然当了皇帝，天下并没有统一，政权并不巩固，因为南北各地还存在着许多割据势力。这些割据势力当中，兵力最多的有东方齐鲁一带的刘永和张步，西北凉州、陇西一带的隗嚣和西南巴蜀一带的公孙述等。他们这些人也称王称帝，想跟刘秀争夺天下。刘秀从建武二年（公元 26 年）起，依靠手下的得力大将，南征北伐，一个个地消灭了这些分裂割据势力。到建武五年，即公元 29 年，刘秀基本上平定了农民起义军。又过了几年，刘秀招降了南方的八位少数民族首领，让他们接受东汉中央朝廷的统一领导。到了建武十六年，即公元 40 年，刘秀终于将全国重新统一起来。

刘秀当了皇帝之后，接受西汉亡国的教训，对政治经济和军事各方面都作了不少改革。当时战争刚刚结束不久，他知道老百姓对各地豪强争夺地盘的战争早已恨透了。决心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例如减轻一些捐税，释放奴婢，减少官差，还不止一次地大赦天下。因此，东汉初年，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刘秀生长在民间，对于百姓的疾苦以及农业的重要性，还是比较了解的。为了治理好这个刚建立的国家，他即位不久，就废除了王莽时期颁布的许多

繁琐又苛刻的法令，并且以身作则提倡俭朴生活，注意倾听民众呼声，认真检查督促地方官吏，推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政策。从建武二年、六年、七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到十四年，连续多次下诏书释放奴婢，规定不论是因饥荒贫穷而卖的、由于王莽的苛政被没收入宫的、战乱中被掳掠的都一律释放。还规定杀伤奴婢不得减罪，又废除了奴婢伤人判死刑的法律。不久将田租从十税一降到西汉时的三十税一。同年，根据战乱以后人口稀少的情况大力精减机构和官吏。地方行政组织减少郡级单位 10 个、县级单位 400 多个。中央也裁减了很多机构和官员。特别是注意精选地方长官有重要作用。因为汉光武帝知道，如果县令或县长不是合格的官员，那么受苦的是当地的广大老百姓，光武帝对地方官吏的选拔非常严格。因此，据说在东汉初年，官吏都比较称职，人民也能安居乐业，户口增殖很多。王莽末年以来战乱频繁，粮食价格上涨到万钱一石，甚至出现“黄金一斤只能换五升豆子”的情况，人民大量流离死亡。刘秀建国时（公元 25 年），全国人口只剩下十分之二，大约 1200 万人。到他的末年，经过 30 年的恢复，人口回升到 2100 多万。

鉴于西汉晚期皇帝权力变小，经常受制于大臣的教训，刘秀改革了许多中央政治制度。首先在朝廷中，虽然保持了三公的职位，却不授给他们实权；实际处理政务集中在“尚书台”，尚书台分六曹（“曹”相当于“部”），设主官尚书令，他的副手尚书仆射以及六曹尚书，这八位官员称为“八座”。他们是皇帝的喉舌，但是尚书令品级是“千石”，仅仅相当于大县的县令，尚书仆射和六曹尚书品级是“六百石”，更只等于中小县的县长，官位很低。这样一来，有位的无权，有权的无位，可以防止大臣擅权，皇帝尽管封那些大功臣很高的官衔，却不必再担心他们会掌握大权削弱皇权，对于官卑职小的尚书，皇帝却可以随意斥骂，有时甚至鞭打，他们完全不具备同皇帝讨论政事共商国是的资格，这就有利于皇帝操纵驱使，更加集中皇权，防止了大臣夺权的事情发生。

其次在具体人选上，他不用开国功臣出任公卿掌管大政，但却给他们高爵重赏在生活上充分优待，对一般过失也加以宽容，所以功臣们都得安享荣华富贵，没有重演西汉初年有的遭屠戮，有的被囚禁那种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悲剧。因为功臣不问政事不掌大权，就减少了同皇帝的利害冲突，也不会因构成威胁而遭到猜忌和迫害。

鉴于西汉晚期外戚王氏权势太盛，导致王莽篡位的历史教训，刘秀对于外戚也特别注意控制，比如阴皇后的兄弟阴识、阴兴虽有功劳才德，也不曾委以机密要职。当时的皇亲国戚都能遵守法纪，没有结党仗势作威作福的。

刘秀出身于农民起义军中，深知军权的重要性，为了集中军权，刘秀又裁减了地方武官，废除了地方军队。从此，人民不再担负地方上的兵役，各地方也停止了操练和每年举行的检阅活动。这样一来，人民虽有为国家服兵役的义务，却没有接受军事训练的机会，军队素质大大削弱。一旦出现紧急事件，用他们来对付敌人，就好比鸡蛋砸石头，总是战败。后来没办法，只好依赖少数民族的军队来完成重大军事任务。

经过刘秀的不懈努力，国家政权日益稳定下来；刘秀的政治抱负终于一点点地实现了，连他早年曾非常向往的美女阴丽华，这时也已经成了他的皇后。东汉政权下的老百姓生活比王莽时期要好得多。刘秀作为一名封建时代的军事家政治家，他的功劳在于统一了中国，从各地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势力手中一步步地夺取地盘，终于把全国统一了。他还在战争的废墟上重新恢

复和发展生产，使社会经济能在很低的起点上继续发展。刘秀统治时期，中国的各方面都有进步。他宣称自己是恢复了正統的西汉王朝，所以后代的人都称这一段历史为“光武中兴”。的确，光武中兴开辟了中国历史的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刘秀和他领导下的一批将领们的历史功绩值得肯定。

## 澶渊之盟

公元4世纪的时候，我国东北辽河上游居住着一个少数民族，叫契丹族。当时，他们还处在氏族社会，过着渔猎和畜牧的生活。后来，人口不断增加，发展成为八个部落。唐朝时候，这些部落结成了部落联盟，各部落公推一人，作为部落联盟的首领，统一领导各部落作战、生产和处理对外关系。

唐朝末年，中原战乱，汉族人民不断迁往契丹族居住的地区，开荒谋生，带去了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当地的契丹族人民在和汉族人民接触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了种地、织布、冶铁和建造房屋等技术，开始过定居生活，社会形态逐步发展。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始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一些贫苦的氏族成员逐渐变成了奴隶。一些部落首领，在跟外族作战中，把掳掠的大批战俘作为奴隶，自己变成了大奴隶主。氏族社会已经进入奴隶制社会。

这样，原来的氏族部落组织已经不适应保护大奴隶主利益的需要了。在这种形势下，契丹族一个叫耶律阿保机的首领，自称皇帝，建立了国家。这就是后来长期与北宋作对的辽国。这个国家机构怎样建立呢？

由于阿保机经常侵入汉族地区，俘虏大批的汉人，受汉族文化的影响比较深，他决心按照汉族的政治制度来建立契丹的国家机构。

五代时期，后梁有个官员，叫韩延徽，出使契丹的时候，被阿保机扣留下来。阿保机看到韩延徽很有才能，就加以重用。韩延徽在政治、军事，以及建立国家机构等方面，帮阿保机出了很多主意，他是阿保机的重要谋臣，后来他被封为契丹国的开国功臣。

公元916年，阿保机在临潢府（今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巴林左旗附近）当了皇帝。称为“大圣大明天皇帝”，他的妻子称为“应天大明地皇后”。他的儿子耶律倍被立为太子。年号叫“神册”。一个新的国家在北方诞生了。

阿保机在建立国家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他派人创造了契丹文字，制订了法律；第二，实行民族区别管理的方法，对那些在契丹统治下的汉族人民，仍旧依照汉族的法律治理。他还模仿汉族的城市，在潢河（今西拉木伦河）沿岸建造京城，这就是辽国的上京。此外，阿保机还采取了一些发展农业和商业的措施。这些做法在当时都是有进步意义的。

阿保机称帝建国，是契丹历史上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从此，契丹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发展成为一个北方强国。

契丹建国以后，阿保机不断向周围各个民族进行大规模的扩张。那时候，中原地区正处于五代十国统治时期，全国各地群雄割据，不断混战。阿保机利用这个机会，大举入侵北方的政权，侵入河北东北部，攻占了許多州县。

耶律阿保机死后，他的儿子耶律德光继位。他就是辽太宗。

耶律德光当上皇帝以后，继续他父亲的扩张政策，不断地侵略汉族地区，掠夺财富和人口。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反叛后唐，请求耶律德光给他帮助。耶律德光亲自率领大军帮助石敬瑭，打败了后唐的军队。他对石敬瑭说：“我从三千里以外的北方，带兵南下，帮助你一战而胜，这是天意吧。作为报答，你应该领受南边的土地，世世代代做我的属国。”于是，就把后唐的国号改为后晋，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石敬瑭甘心充当契丹的属国，除了上表称臣，还称比自己小11岁的耶律德光为“父皇帝”，自己甘当“儿皇帝”，丢尽了中原汉族人民的脸面，是个名符其实的大汉奸。



为了换取契丹人的支持，石敬瑭又把现在的河北、山西北部的幽州（今北京市）、云州（今山西省大同市）等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幽州也叫燕京，所以又称这些地方为燕云十六州。此外，石敬瑭每年还向契丹进贡绢 30 万匹。从此，华北平原就完全控制在契丹的手中，辽国的势力更大了。

石敬瑭死后，他的侄子石重贵继位。石重贵只肯向契丹称孙，不肯称臣，而且准备收复幽云十六州，耶律德光大怒，出兵攻打后晋。结果双方互有胜负，辽太宗没有得到便宜，就退兵回去了。

公元 970 年，后周的大将赵匡胤篡夺了政权，建立北宋，赵匡胤就是宋太祖。

宋太祖建国之后，花了 13 年工夫，灭了南方五国，接着，就出兵攻打北汉。北汉请辽国出兵援助，两面夹攻，结果宋军吃了败仗。不久，宋太祖得病死去，他的弟弟赵匡义继承皇位。这就是宋太宗。

宋太宗决心完成统一北方的事业，公元 979 年，他亲自率领四路大军围攻北汉都城太原。辽军又来援助，这次宋太宗改变了战术，派兵截断援兵要道。太原城在宋军重重包围之中，外无援兵，内无粮草。北汉皇帝刘继元没法，只好投降。刘继元手下有一名老将杨业，也归附宋朝。宋太宗早就听说杨业武艺高强，十分器重他，任命他做大将。杨业及其子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杨家将。

北汉刚平定，宋太宗就想乘胜攻打辽国。夺回石敬瑭送给辽国的燕云十六州。许多大将感到士兵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带去的粮饷也快要吃完了，不愿再打下去。这时候，大将崔翰迎合宋太宗的心意说：“攻打辽国，应该乘胜进军，辽国没有准备，非常容易，切不可失掉战机。”宋太宗听了，非常高兴。他没等各方面做好准备，军队也没有休整，就马上下令出兵。

辽国确实没有准备，一开始宋军取得了一些胜利，收复了岐沟关和涿州（今河北省涿县一带），很快打到了幽州城南。宋太宗更高兴了，命令军队继续向前进攻，准备一举收复北方的失地。

当时辽国军队已经集结完了，并且有了一些准备。大将耶律斜轸派支军队将宋军诱到包围圈内，自己带领大军，绕到宋军背后，偷袭宋军。宋军也有所准备，奋勇作战，杀死辽军一千多人。就在这时候，耶律斜轸带领大军从背后偷偷杀了过来。宋军腹背受敌，不得不向后退却。耶律斜轸也不敢再战，把军队退到清沙河北（今北京市昌平区一带），声援幽州，准备等力量强大时再进行决战。

耶律斜轸的军队一退，宋军就把幽州团团包围起来。宋太宗督促将士加紧攻城，可是，宋军从太原赶到幽州，千里行军，连日作战，已经疲惫不堪，锐气大减。战斗力怎么也提不起来了。

这时候，正在北方打猎的辽景宗耶律贤，听说幽州危急，连忙召集大臣商量。辽景宗准备放弃幽州。大将耶律休哥说：“请让我带一支军队，前去救援，如果失败了，再退出幽州，也来得及。”辽景宗同意了他的建议，派他和另一个大将耶律沙带领十万大军，前往幽州。

耶律沙带领一支辽军日夜兼程，赶到幽州。宋军早有准备集中力量迎击。双方在高粱河（今北京市西郊）打了起来。耶律沙远道赶来，人困马乏，加上军队人数不多，第一仗就被打得大败，只好退兵。

宋军连战连胜，士气渐渐恢复了。宋军围住幽州城日夜攻打。但幽州的守将耶律学面也抵抗得非常坚决；宋军久攻不下。只好把军队分散，四处出

击攻占别的地方，相继收复了蓟州、颍州，获得了大批的物资和人口。

这时，耶律沙已经退到幽州城外，宋太宗命令加紧攻打幽州城。眼看就要攻下幽州，突然两支辽军出现在宋军的面前，左右两路一齐杀到。原来辽主恐耶律沙抵抗不住宋兵多将广，又另派耶律斜轸和耶律休哥兵分两路来援。耶律沙见援军到来，雄心勃发，乘机反扑，一番冲杀，宋军大败，四散奔逃。宋太宗奔逃中与众将失散，单人独马，加上天黑路不平，一下子连人带马掉入泥潭之中，而追兵又近。正当紧急关头，杨业护送军粮经过，救了太宗。这时，耶律休哥领追兵赶到了，杨业让其子护住太宗，自己指挥军队，击退辽兵。把太宗安全送回国内。这一败，攻打幽州收复燕云十六州计划告吹，而且军队损失惨重，这是北宋立国以来对辽战争中第一次重大失败。

这次战争，就是高粱河之战，又叫幽州之战。宋太宗为了收复燕云十六州，发动这次战争，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他事先缺乏充分的准备，仓促出兵，因此失败了。宋军收复的一些失地，又被辽军占领了。

高粱河之战以后，辽宋之间又进行过不少战争。宋朝军队中出现了许多抗辽英雄，其中杨业为首的杨家将的事迹最为著名。

杨家将最早的统帅就是杨业，本来是北汉的大将。北汉被宋朝平定以后，他就做了北宋的将军。他后来担任代州（今山西省代县）刺史，守卫宋朝的北方边境。因为他英勇善战，所以人们称他“杨无敌”。

公元980年，辽朝派了十万大军攻打雁门关。雁门关是代州北面的重要关口，如果雁门关失守，代州也难保了。那时候，杨业手下只有几千人马，兵力相差很大。杨业是个有经验的老将，知道靠硬拼是不行的，就把大部分人马留在代州，自己带领几百名骑兵，悄悄地从小路绕到雁门关北面敌人后方。

辽军向南进军，一路上没遇到抵抗，正在得意。忽然，后面响起一片喊杀声，只见烟尘滚滚，一支骑兵从背后杀来，像猛虎冲进羊群一样，乱砍猛杀。辽兵毫无防备，又惊又怕，结果让杨业的军队打得尸横遍地，大败而归。胜利之后，宋太宗非常高兴，专门嘉奖杨业，并且升了他的官。

辽景宗见这一次又失败了，非常生气，准备亲自带兵，去与宋军决一死战。当下带领精兵20万，亲为统帅，命耶律休哥为先锋，向瓦桥关而来。瓦桥关守军因为辽兵两次进犯都大败而回，产生了轻敌思想，竟开关迎敌，面水列阵，等他来打，到了交锋之时，才知道辽军战斗力很强，但为时已晚矣。而耶律休哥因两次出战都大败而回，心里正憋着一口气，他越发鼓起勇气，督促部众，直闯宋军战阵，把宋军杀了个落花流水，抛关丢寨，逃回莫州城内。耶律休哥随后赶到，把莫州城团团围住。战报传到朝廷，宋太宗率领大军就要出战辽景宗。辽景宗听说宋太宗要来了，攻了莫州几次，引兵退去。太宗来到大名，听说辽兵已退，便想再次攻打幽州。丞相李昉力阻，劝他吸取高粱河之役的教训。太宗对高粱河之役犹心有余悸，便作罢回汴梁去了。

从此之后数年内，宋辽双方都不再有大的战争。

过了几年，辽景宗耶律贤死去，即位的辽圣宗才12岁，由他的母亲萧太后执政。辽国政局显得很不稳定，有个边将向宋太宗上奏章，认为辽朝政局变动，正好趁这个机会收复燕云十六州失地。一直想统一北方的宋太宗接受了这个意见。公元986年，宋太宗派出曹彬、田重进、潘美率领三路大军北伐，并且派杨业做潘美的副将。

三路大军分路进攻，旗开得胜。潘美、杨业的一路人马出了雁门关，很

快就收复了四个州。但是曹彬率领的主力因为孤军深入，被辽军杀得大败。宋太宗赶快命令各路宋军撤退，保护北方边境。

潘美、杨业接到命令，就领兵掩护四个州的百姓撤退到狼牙村。那时候，辽军已经占领寰州（今山西朔县东），攻击力很强。杨业建议派兵佯攻，吸引住辽军主力，然后派精兵埋伏在退路的要道，掩护军民撤退。

监军王侁反对杨业的意见，说：“我们带了几万精兵，为什么这么胆小？我看我们只管沿着雁门大路，大张旗鼓地行军，也好让敌人见了害怕，然后再攻打寰州。”

杨业说：“现在敌强我弱，这样干是要失败的。”

王侁带着冷嘲热讽的口吻说：“杨将军不是号称‘无敌’吗？现在在敌人面前畏缩不战，是不是另有打算？”

这一句话把杨业激怒了。但他并不想与王侁争辩。他说：“我并不是怕死，只是看到现在时机不利，怕让兵士们白白丧命。既然你们一定要打，我可以打头阵。”

主将潘美早就与杨业不和，也支持王侁的主张。杨业无可奈何，只好带领手下人马出发了。临走的时候，他流着眼泪对潘美说：“这个仗肯定要失败。我本来想看准时机，痛击敌人，报答国家。现在大家责备我避敌，我不得不先死，以表明我的报国之心。”

接着，他指着前面的陈家峪（今山西朔县南），对潘美说：“希望你们在这个谷口两侧，埋伏好步兵和弓弩手。我兵败之后，退到这里，你们带兵接应，两面夹击，也许有转败为胜的希望。”

说完，老将军杨业便带领人马直杀向朔州。

辽军听说杨业前来，非常认真地准备应战。首先，出动大批军队把宋军团团包围起来。杨业和他的部下，虽然英勇奋战，毕竟寡不敌众。他们从中午一直打到傍晚，只剩下一百多人，奋不顾身突出重围，边战边走，向陈家谷退却，指望着潘美前来接应他们。

哪知道潘美的军队早已离开了陈家谷，根本没来接应他们。原来潘美、王侁在谷口等候了多时，得不到杨业的消息，以为辽军已经被杨业打败。王侁怕杨业独自立了大功，一心想去抢占功劳，连忙带领军队前进。潘美也带领军队向西南方向盲目前进。不久，他们听说杨业打了败仗，又赶快向后逃跑，再也顾不得接应杨业了。

杨业带领一百多人，转战到陈家谷，连宋军的人影也没看到，不觉失声痛哭起来。他决心以死报国，就对部下说：“你们都有父母妻子，不必跟着我一道死，赶快夺路逃去，好回去报告朝廷。”部下都感动得哭起来，没一个人肯逃走。最后，兵士都战死了，杨业的儿子杨延玉和部将王贵也牺牲了。杨业身上受了十几处伤，浑身是血，还来回冲杀，杀伤了几百名敌人。不料一支箭飞来，正射中他的战马，马倒在地下，把他摔了下来。他躲在树林里，可是辽兵乘机围了上来，把他俘虏了。

杨业被俘以后，辽将劝他投降。他叹了口气说：“我杨业本来想消灭敌人，报答国家。没想到被奸臣潘美陷害，落得全军覆没。哪还有脸活在世上呢？”他在辽营里，绝食了三天三夜，牺牲了。

杨业战死的消息传到东京，朝廷上下都为他哀痛叹息。宋太宗丧失了一名勇将，自然也感到难过，把潘美降职处分，王侁革职查办。

杨业有七个儿子，除了杨延玉牺牲以外，其余6个儿子都得到了官职。

其中杨延朗（后来改名杨延昭）最有名，（他就是传说中的“杨六郎”）。杨延昭镇守边关二十多年，尽职尽责，多次打败辽军的侵扰，保卫了北宋的边境。有一次，辽军大举南侵，他建议北宋朝廷乘机出兵直捣辽国的后方，收复燕云十六州，可惜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他们一家的英勇事迹受到人们的传诵和赞美，民间流传的杨家将故事，就是根据他们的事迹发展起来的。

宋朝这一败之后，辽国又出兵 10 万，再次南侵，被北宋几位边将张齐贤、尹继论、李继隆小胜几次，有一次更把耶律休哥打伤了，这才退走，不敢大举南侵了。从此，辽宋双方战事基本平静。在这段时间里宋朝一是与西夏冲突，二是发展经济。

公元 997 年，太宗病死，真宗赵恒即位。真宗即位后，虽励精图治，又有寇准等大臣的辅佐，但由于边疆不宁，加上内地官员荒淫残暴的劣迹而导致人民反抗之举经常发生，所以国势反而不如太宗时强盛了。

寇准是华州下邽（今陕西省渭南县）人，从小聪明好学，为人正直。年轻的时候考中进士，后在地方上和中央政府里做官。寇准做事，刚强果断，很快受到宋太宗的信任。宋真宗曾任命毕士安为参知政事。毕士安向宋真宗谢恩，宋真宗说：“不用谢恩了，我马上要任命你做宰相呢。”并问他：“谁可以跟你一道担任宰相？”毕士安回答说：“寇准天资聪明，又忠义，能处理大事，我不及他。”宋真宗又问：“听说他刚强任性，听不进不同意见。”毕士安说：“寇准一心为国，主持正义，反对奸邪，所以好多人讨厌他，说他的坏话。如今北方边境不得安宁，正应该重用像寇准这样的人。”就这样，宋真宗任命毕士安和寇准为宰相，共同对付辽国的入侵。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 年），辽国调动 20 万大军，打到靠近黄河的澶州（现在的河南省濮阳县西南），澶州是北宋的门户，直接威胁着宋朝的都城汴京。告急文书象雪片似地飞向汴京，宋真宗召集群臣，商量对付的办法。参知政事（就是副宰相）王钦若是江西人，他从自己的利益着想，主张放弃汴京，把都城迁到金陵。另一个参知政事陈尧叟是四川人，主张把都城迁到四川的成都。他们都为了自身的利益主张迁都逃跑，避开敌人的锋芒。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大臣提出另外的建议。

这时候，一个大臣站起来说：“主张迁都的人，应当杀头！现在上下齐心，要和敌人决一胜负。怎么能提逃跑的事呢？陛下应当趁这个时机亲自出征。为什么要放弃京城远逃呢？京城一失，人心崩溃，敌人长驱直入，天下还保得住吗？”宋真宗回头一看，这个大臣就是宰相寇准。

宋真宗想了一想，觉得寇准的话不错，但他仍然心有余悸，怕自己一旦亲征，会有被辽国俘虏的危险。寇准上前来进一步讲明宋军具有抵抗敌人的实力，这下宋真宗才真的下了决心亲征。

这年的 11 月份，宋真宗率领文武大臣准备到澶州北城。随行的有大队人马。刚刚到韦城（今河南滑县东南），听到南下辽军兵势强大，一些随从大臣吓坏了，趁寇准不在的时候，又在真宗身边进谗言，劝真宗暂时退兵，避一避风头。宋真宗本来很不坚决，一听这些意见，动摇起来，又召见寇准，问到底应该怎么办？

寇准严肃地说：“主张南逃的都是懦弱无知的人。现在敌人迫近，人心动荡。我们只能前进一尺，不可后退一寸。如果前进，河北各军士气百倍；如果回兵几步，全军就溃退瓦解，敌人紧紧追赶，那么大宋的江山就完了，陛下想到金陵也去不成了。”

宋真宗听寇准说得义正辞严，没话可说，但是心里还是没底，老是怕这怕那，心慌得很。寇准看到这种情况，决定用计激励宋真宗的抗战决心。

寇准走出行营，巡视军队的时候，正好碰到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寇准对高琼说：“您受国家栽培，该怎么报答国家？”

高琼说：“我愿奋勇杀敌，以一死报国。”

寇准连声赞叹，就带着高琼又进了行营，重新把自己的意见向宋真宗说了一遍，并且说：“陛下如果认为我的话不对，请问高琼将军！”

高琼在旁边接着说：“宰相说的话是对的。禁军将士的家属都在东京，都不愿南逃。只要陛下亲征澶州，将士们肯定信心倍增，为国为家都应该留在东京。我们决心死战，肯定能够击败辽兵。”

宋真宗听了高琼的话，沉吟半晌，还没开口，寇准紧接着又说：“机不可失，请陛下立刻动身！再晚就来不及了！”

在寇准、高琼和将士们的一再催促下，宋真宗才决定动身到澶州去。

这时候，辽军已经三面围住了澶州。宋军在要害的地方设下弩箭。辽军主将萧达兰带了几个骑兵视察地形，正好进入宋军伏弩阵地，宋军弩箭齐发，萧达兰中箭丧命。

辽军主将一死，萧太后又痛惜又害怕。她又听说宋真宗亲自率兵抵抗，觉得宋朝暂时不好征服，就有心与宋朝讲和了。

澶州城横跨黄河两岸。宋真宗在寇准、高琼等文武大臣的护卫下，渡过黄河，到了澶州北城。这时候，各路宋军也已经集中到澶州，将士们看到宋真宗的黄龙大旗，士气高涨，欢声雷动，打退了辽军的围城部队，并且将辽军追击到很远的地方。

萧太后派使者到了宋朝行营议和，要宋朝割让土地。外加金银布帛。

其实，宋真宗并没有抗辽的决心。早在他亲自出征以前，就派一个叫曹利用的官员，秘密到辽国进行谈判。辽军因为宋军越战越强，而自己又不断受到挫折，处境越来越不利，就同意和宋朝议和。

一开始寇准坚决反对议和，主张乘胜收复燕云十六州。一些主和派便放出谣言，说寇准想利用军队，为自己夺取权势。在这种情况下，寇准没有办法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只好同意议和。

要议和，就得每年给辽国一些银子和绢。给多少呢？宋真宗对派去议和的曹利用说：“如果不得已，即使每年给一百万，也可以答应下来。再多就不能答应了。”

寇准私下一再嘱咐曹利用说：“虽然皇上许诺给百万银绢，可是，你答应数目不能超过30万。超过这个数目，我就杀你的头！”曹利用也是一位有爱国心的官员，他与辽国经过艰难谈判，终于在第二年（公元1005年）年初，宋辽双方订立和约，规定北宋每年给辽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因为这次和约是在澶渊（即澶州）订立的，所以历史上称为“澶渊之盟”。

和约订立以后，一些人问曹利用每年送给辽国多少银子，曹利用伸出三个手指头，宫廷内误传为三百万。宋真宗大吃一惊，说：“太多了！”接着又说：“姑且了事，这样也可以。”等到知道确切数字以后，这个一心妥协的宋真宗高兴极了，认为这是宋朝谈判的“胜利”，还亲自写了诗表示庆祝，根本没想到这是一个屈辱的条约。

打这以后，宋朝统治者加紧向人民榨取更多的银绢，付给辽国。百姓的负担加重，生活更加痛苦了。

由于寇准和其他一些将领的坚持抗战，北宋到底避免了更大的失败。宋真宗也觉得寇准有功劳，挺敬重他。但是原来主张逃跑的那位王钦若却在宋真宗面前说，寇准劝真宗亲征，是把皇上当赌注，孤注一掷，如果皇帝被抓住了，简直是国家的一个大耻辱。宋真宗一想起在澶州的情景，真有点后怕，就反过来怨恨寇准，竟把那忠心耿耿的寇准的宰相职位撤了。

此后，辽国统治者每年获得大量银绢，并不满足。到了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兴宗又扬言要发兵南下。宋仁宗连忙又派人去谈判，答应每年再增加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又一次向辽国屈辱求和，辽国这才作罢。北宋朝廷软弱无能，在外族入侵时只能退让妥协。

从979年，太宗伐辽到1004年辽国萧太后伐宋，前后共25年。这25年中，辽宋两朝兵戎相见你来我往，大小数百战。单是重大的战役就有高粱河之役、澶州会战，直到澶渊之盟时，算是基本结束，至少两国短期内不会再起战争，两国边境上的人民也可以安居乐业，努力发展生产了。第二年正月，真宗大赦天下，放河北各地强壮士卒归农，对于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确是起了好的作用，同时，双边设置榷场，互通贸易，对民族交流、民族融和也起了促进作用。但如果站在北宋的立场上考虑，那么澶渊之盟是弊多利少的短浅之见了\_\_

北宋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鉴于五代中权臣大将篡位的教训，杯酒释兵权，削夺了朝中与他一起打天下的诸多大将的兵权。他说：“要想富贵，不过是想多积些金钱，满足自己的娱乐，使子孙不再受苦罢了，没有旁的意义。我为你们打算，何不抛却兵权，出守边藩，买些良田美宅，为子孙立定个永远不动的产业，养些歌童舞女，伴着日夜饮酒欢娱，就借此安安稳稳地终享天年。我再和你们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忌，上下相安，世代亲睦，这样不是很好吗？”于是这一番话便成了宋朝的基本国策，就是经济上优待官吏，在政治权力上却抑制他们的发展。因此，这样造成的后果，一是官吏人数愈来愈庞大；二是政府财政为支付官员的俸禄开销也愈来愈大，故而经常发生财政困难。现在，每年给辽国30万巨款，外加其他物资，因为有了先例，以后与西夏与金国的冲突也都以此方式解决，国库更为空虚，接下来对社会的不良影响是可以想象的。赋税过重导致农民起义，内忧外患使王安石变法出台，以后更直接影响到靖康之变。

## 蔡伦改进造纸术

造纸、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上的重大成就，通常都把它说成是我国历史上的四大发明。这些光辉成就，直至今天，仍然是我们中华民族引以自豪的。这些发明，造纸术是其中重要的一项。这不仅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也显示了我国古代科学家如蔡伦等人的钻研精神，放射出我国古代文明的光辉。

我国是世界上文明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传说在五六千年以前的神农时代，人们就知道“结绳记事”。到了黄帝时，史臣仓颉“初造书契”。这些传说，虽不可尽信，但是说明在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了文字，就有了书写文字的需要。半坡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的陶器上都有原始文字。有了文字，就要求有记录文字的工具。商周时代，人们把文字刻在龟甲和羊牛的骨头上，或者刻在青铜器上，也有刻在石头上的。今天考古出土的甲骨文、青铜器的铭文，就是用龟甲兽骨和青铜器作为书写文字的材料保存下来的。春秋时候，笔出现了，刀笔并用，把字刻或写在竹简木牍上。最早的笔叫“聿”，是蘸了漆写字的。有了笔，很快就有了砚，那是用来调漆的。秦朝守长城的大将蒙恬改进了笔，做成了现在我们常见的毛笔。笔改进以后不久，墨出现了。用砚磨墨，毛笔蘸了墨写字，就比用漆方便多了。

甲骨和金石，数量有限，况且使用时又笨重，书写既不方便又费工。所以到了春秋战国和秦汉以后，随着纺织业的发展，人们便用竹简、木简作为书写材料了。竹简、木简，书写文字比起甲骨、金石方便多了。我国古代史籍中，有许多关于用竹简、木简书写文字的记载。汉武帝末年，在孔子家宅的墙壁里发现战国的竹简。《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古书，最早的本子就是写在竹简上的简策。以后历代都有古代竹简、木简的发现。最多的是1930年在居延地区发现汉代木简一万多枚，就是通常说的《居延汉简》。

解放以后，战国至汉代的竹简、木简、帛书出土的更多了。1957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古墓中发现战国竹简

229枚。1959年甘肃武威磨嘴子六号汉墓出土竹木简

490枚。至于几枚、几十枚出土的地方就更多了。

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4940多

枚，有《孙子兵法》、《孙臆兵法》、《六韬》、《尉缭子》等古代兵书，也有《管子》、《晏子春秋》等著作。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竹简、木牍600多枚、帛书十余种，其中帛书内容为《易经》、《老子》、《战国策》、《战国纵横家书》和天文、历法、五行、杂占、数术等方面的书籍，还有两幅地图。1972至1974年，在甘肃居延出土汉简近二万余枚。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发现竹简1155枚。

这些出土的大量竹简、木牍和帛书，充分说明在纸发明以前，人们是用竹、木、缣、帛作为书写材料的。

所谓的简，就是经过削制的狭长竹片或木片。简是通称，具体地说，竹片称简，木片称札和牍。人们为了保存和使用，把很多简编缀在一起，称为策。“策”和“册”通用，“册”字就是把竹简或木牍用绳联结在一起的形状。古代把用竹简或木简记事著书，成编的叫做册或策，如《战国策》，就是记录战国时事的书。

当时对一般记事就是写在竹简上，对于一些重要文告或著作，就要编缀

成册。我们今天把一本书叫做一册，也是由这演变来的。

战国至秦汉时期，人们除了用竹木做书写材料外，同时也用缣帛。缣帛是用丝棉织成的织物，把文字写在缣帛上，然后卷起来保存，后来称它为帛书。当时把写成的帛书卷在一起的，称为卷，今天把一本书称为一卷，就是从这发展来的。

传说汉代初期有一种纸叫做幡纸，可以代替竹筒来写字。当时许多皇帝的诏书都是用这种纸写出来的。这种幡纸的制作材料很精良，是丝质的絮纸，而不是后来使用的真正的纸。汉代以后，既然把丝絮做的絮纸叫做纸，以后也就把书写文字用的缣帛叫做纸了，时间一长，纸就成为用于书写材料的专用名称了。

在西汉和东汉时期，还有一种比较昂贵的纸叫“蔽其鼻”纸，这也是一种用丝绵制成的纸，这种纸产量少，成本高，只能供皇帝和大臣们使用，老百姓根本用不起，还不能成为社会上广泛使用的书写工具。这种絮纸，是从漂絮中得来的。古代养蚕抽丝，好的蚕茧，用来抽丝，次茧用作丝绵。在制作时，要在水中漂洗，漂洗完把丝绵拿走以后，遗留在曝晒的篾席上的丝绒，便形成一层薄薄的丝膜，晒干后就成为絮纸，当时用以写字的絮纸，就是缣丝生产的一种副产品。

作为书写文字材料的竹木和缣帛，比起甲骨金石来说，是进了一大步，但是这种材料，都各有它的局限性。竹筒木牍原料多，容易得，价格低廉，但是筒牍的面积小，写不了多少字。

从记载和出土的木简、竹简看，秦汉时期的竹木简长度大约在 20 厘米到 70 厘米左右之间，宽约 1—5 厘米。这样一来，装订成册的书籍文件或私人信件都非常笨重，体积很大，存放起来要堆成很大一堆，携带和阅读都太繁重。据《史记·滑稽列传》记载，汉武帝时，有齐人东方朔，好古传书，他每次出门旅行，都要用好几辆大车来装运他的用竹简写成的书，真是太不方便了。

由于缣帛和絮纸以及竹木简本身的局限性，这些书写材料都无法在社会上广泛应用。

不过缣帛和絮纸都是用纤维交织而成的，这样便启发人们用数量多、价格低廉的植物纤维去造纸。在民间很多人都用大麻的纤维捣碎来做纸，于是在西汉宣帝以后，便有了麻纸。

1933 年在新疆罗布淖尔，1957 年在陕西省西安附近灞桥、1974 年在甘肃居延、1978 年在陕西扶风中颜村等地，都发现西汉的麻纸，可知西汉时期，人们已经知道用植物纤维造纸了。不过西汉的麻纸，纸质太粗糙了，纸面上还有未经粉碎的麻筋、绳头等纤维，纤维交织很不紧，松散不匀而有大小不同的透眼，纸面也不平滑，颜色黄白不纯。这种麻纸只能说是最早的纸，根本不能用它写字，只可以做包装之用，所以也代替不了竹筒木牍，更不能和缣帛相比。到了东汉时，蔡伦研究了麻纸制作方法，改进了生产技术，纸才真正成为书写文字的材料。

蔡伦，是我国东汉时期的著名科学家。多少年来，都传说他是我国最早发明纸的人。据历史书籍的记载，他发明用树皮、麻头、旧布、破鱼网等造纸，从这时开始纸便广泛被应用了。虽然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我国许多地区发现了西汉时期的麻纸；但是实际上，这一历史事实并不能抹煞蔡伦在造纸技术上的作用，因为一个科学家的发明创造，都不可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



都不能离开前人积累的知识和生产者的实践，蔡伦制造的植物纤维纸，就是在西汉民间生产麻纸技术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研究与改进，克服了麻纸质地粗厚，纤维组织松散，色泽不纯等不适合于写字的弱点，改造成为用于书写文字并能大量生产的真正的纸。蔡伦这一研究成果，使我国纸的制造和应用，比西方要早一千多年。直到现代，尽管各种电子产品信息产品出现，纸张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纸的广泛应用和大规模生产，不仅为我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而且为世界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发展，提供了恰当的手段与条件。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蔡伦的贡献是巨大的。

蔡伦，字敬仲，东汉桂阳郡耒阳县（今湖南省耒阳县）人。大约生于东汉光武帝中元末或永平初年。是东汉和帝时期到安帝时期的一位有权势的宦官。他在宫廷当差的时候，曾参与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由于他为人正直，敢于向皇帝提意见，很得皇帝和太后的信任。

蔡伦的家乡耒阳县城东南都紧邻着耒水，北面有肥水，在肥水西北，就是蔡伦出生和幼年生长的地方。他很小就熟悉水乡风土人情，生活在水乡渔村中的蔡伦，对社会生活和生产情况一直非常关注，他注意学习劳动者的知识与智慧，这一点在以后对造纸术的改进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水乡生活的蔡伦，每当桑蚕成熟季节，他观察了妇女们在溪水中漂絮的情况，便产生了改进造纸技术，采取利用废旧物资作原料，扩大原料来源，降低造纸成本，使纸张普及的想法。用什么纤维来代替丝絮呢？蔡伦每天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蔡伦家临湖塘，绳头、麻屑和破鱼网到处都是，他便想到如何把这些东西捣成细微的纤维作为造纸的纤维。一方面可以把这些废旧物变成有用的东西，另一方面又可扩大造纸原料，降低纸的成本，使纸张得到普及。于是蔡伦便在他家宅的西面，用大石凿一石臼，把收集来的麻头，破鱼网等，加工捣碎，然后用缸盛上水，把捣碎的麻头等放在水中浸泡，除去泥垢杂物，反复的冲洗，捣制，做成纸浆，开始造纸实验。经过反复的实验，在纤维凝聚和纸面平滑等方面，总是不如丝絮光滑洁白，于是蔡伦又联想到只用麻头纤维，还是粗糙，便又采用旧布缕、树皮等东西，混杂一起，进行加工试验，在不断摸索中逐渐研究出制纸的方法来。蔡伦虽然研究出造纸法，还不能广泛的推广，也未能大批的进行生产，没有成为被社会广为采用的造纸技术。

不久，蔡伦被东汉宫中选为宦官，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与发明创造并重的生活。

蔡伦的青年时期，正值东汉初年，经过西汉末年社会动荡以后，社会走向安定。到汉明帝时，承袭光武帝刘秀的各项改革政策，经济开始繁荣。朝廷中，沿袭光武帝加强集权的制度，内廷事务日趋繁多。明帝永平中期，为了充实内廷，增置内朝官吏，曾增置中常侍四人，小黄门十人。至明帝永平末年，蔡伦被召入宫，给事宫掖。蔡伦有才能，为人敦厚，在宫中非常尽心竭力。当时，外戚势众，内外官僚，很少有机会接近皇帝，皇帝为了亲揽朝政，不使权力旁落，重视内廷官吏的委用。章帝即位后，蔡伦被用为小黄门，侍从皇帝左右，受尚书事，朝廷中外事务，多委其办理。宫中公主、太妃等生活事宜，也由他掌管。蔡伦在宫中给事二十多年，上至皇帝，下至后妃，颇受信任，得到朝中大臣们的信赖，成为当时有才能的内官。

公元 88 年正月，年仅 33 岁的章帝死了，皇太子刘肇便于这年的 2 月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就是汉和帝。和帝当时仅有 10 岁，不能亲理朝政，一切政

务皆由窦太后临朝处理。窦太后掌政以后，外戚窦宪兄弟便依靠太后权势，扩大自己的势力，朝廷大臣都对他有所畏惧，这样，也使皇帝很难与朝中大臣商议政事。在朝廷内外臣僚无法接近皇帝的情况下，皇帝为了保持自己的势力，只有依靠常在身边的宦官，对他们日益信任，一切事务，都让宦官给他办理，这样宦官的人数也增加了。蔡伦也由小黄门升为中常侍。他侍从皇帝左右，出入宫廷，掌管宫内事务，有时在内廷参议朝廷事务。蔡伦是一个有才学、为人诚实的人，办事认真负责，勤勤恳恳，因而深得和帝信任。他看到皇帝有什么错误决定，从来不怕触犯皇帝的尊严，极力劝阻和进谏，曾经有几次触犯皇帝，劝止了皇帝的错误行事。蔡伦虽然做了中常侍，但他不以自己的权势自居，不与有权势的臣僚往来。每当他给假休息时，便关起门来，谢绝宾客，在家休息，做些喜好的事。他常常到园地去莳花种菜，以为消遣。

和帝即位后，外戚窦宪权势日增。窦宪依靠他妹妹窦后的权势，从郎官累进为黄门侍郎、车骑将军，以至大将军，屡受封赐，显赫一时。当时朝廷中的王公、大臣、公主、驸马等外戚，都对他很惧怕，不敢触犯他。他依靠权势，曾夺取沁水公主家的园田，公主不敢与他争执。这样他便由富贵显赫，进一步滋长了弑主夺权的政治野心。永元四年（公元92年），窦宪便和其弟窦笃等密谋，入宫杀害和帝。这个阴谋为和帝发觉，和帝免去窦宪大将军及其弟的官职，使回封国迫使自杀。这一事件以后，和帝对内廷宦官，更为信任，内宫势力于是日渐发展。

汉和帝见蔡伦有才能，留心工艺器械，于是让他任中常侍职务外，兼领尚方令，负责掌管宫中御用刀剑器物的制作。从永元九年（公元97年）开始，便从事监督各种器物的手工作业，他注意选用技术熟练的工匠，考究制造工艺，监制刀剑和所用器物，造出的御用秘剑和各种器具，工艺精致，样式美观，得到皇帝和宫中人们的称赞。由他监制的兵器和器物，都非常坚固耐用，其技术工艺和样式，都成为以后工艺制造上的模范。蔡伦在制造器械的同时，便想起如何利用宫廷的设备和尚方令所属作坊的充足人力和物力，进一步改进造纸技术，扩大纸张生产，改变用简牍和缣帛书写的情况。于是便在西汉制造麻纸经验的基础上，进行造纸的实验。他一方面建立造纸作坊，安装各种造纸设备，亲自到作坊中进行指导；另一方面，翻阅各种资料，对以前造纸经验，工艺流程，都做了认真细致的研究。他研究的结果，认为东汉以前生产的麻纸，纸面不平滑，色泽不白，纸质粗糙不细和脆硬的原因，就是由于造纸过程中对原料的纤维的分散度和腐蚀度处理的不好。不能大量生产，是因为单纯使用麻纤维造纸，原料来源不足。如果改变这种情况，必须扩大原料来源，改进生产工艺流程，增加舂捣、腐蚀、漂洗等化学处理等加工工序。

为了把纤维捣得更烂，使造出来的纸更加细腻光洁，蔡伦又在造纸用的破布、破鱼网、树皮、麻头等原料中加进了带腐蚀性的石灰等东西，一起放在石臼中舂捣。结果，不但原料捣得更烂了，并且还意外地出现了漂白的作用，使得捣成的纸浆变成了白色。可是用这样的纸浆直接压制成的纸，仍然不能除掉那些实在捣不烂的粗纤维，并且由于放了石灰等东西，做成的纸又出现了许多细小的颗粒。

此外，怎样使纤维柔软，用什么方法增加纸的白度等，他都认真的研究和仔细观察，使造纸技术，比西汉的麻纸有了很大的改进。

蔡伦又接着做试验。他把捣烂了的纸浆兑上水调稀，放在一个大木槽里，然后用细帘子去捞那浮在上面较细的纸浆。等细帘子结了一层薄薄而又均匀的纸浆以后，把它晾干，揭下来就成了一张洁白细腻的纸。这样蔡伦改进造纸术的试验终于成功了，造出了便于写字用的纸。这时候是汉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

蔡伦把自己改进造纸术的经过上奏汉和帝。汉和帝听了很高兴，叫蔡伦继续改进，扩大造纸的规模，造出更多更好的纸来。蔡伦没有辜负汉和帝的信任，果然造出了更多更好的纸。蔡伦在汉安帝的时候被封为龙亭侯，所以人们就把蔡伦造的纸叫做“蔡侯纸”。

纸普及以后，公文、书籍都用纸张抄写，改变了原来使用缣帛和简牍的情况，使缣帛和简牍逐渐被淘汰。也方便了人们生活，人们可以用来写书信，密切了联系。朝廷少府守宫令的库藏中，保存大量纸张，作为各种书写用纸。在社会上，纸的生产也大量发展起来，造纸已从纺织业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蔡伦改进造纸技术，给人民生活带来许多方便，在民间人民都称赞他。

蔡伦造纸，首先是扩大了原料的来源。东汉以前，除了缣丝的副产品絮纸外，作为纸张使用的麻纸，主要是用麻的纤维生产的麻纸，这种纸质地粗糙，不能用于书写文字，而是用于包装。蔡伦为了降低造纸成本，扩大造纸原料，利用废旧物，采用破旧鱼网、树皮、麻头、旧麻绳、破布之类来加工成造纸原料，进行造纸，这不仅增加造纸的数量，也使造纸成本降低，使纸价低廉，可以广泛应用。

今天虽然从文献记载中，无法了解蔡伦当时造纸的具体情况，但是从今天考古发现东汉时麻纸的结构，以及东汉以后史书中记载的造纸技术等方面去分析，对蔡伦当时造纸的过程，大体上可以作出推测。

东汉时候的纸比西汉麻纸明显精细多了，要达到这样的技术标准，最低的生产流程也要包括如下若干工序：

**浸湿原料。**首先要把备好的原料，无论是破旧鱼网，还是麻头、旧麻绳、树皮和破布之类，都要放在盛满水的木桶或缸之类的容器里浸泡，至完全浸湿以后，再取出进行第二个工序。

**切碎原料。**当原料完全浸透以后，用刀剪切碎，尤其是鱼网、绳头、树皮等，必须切断，使成纤维，才可进行进一步加工。

**浸灰水。**为了使纸富有柔软性，加工时使纤维分散细小，必须采用带有碱性的灰水浸泡，使原料腐蚀成碎小纤维。

**蒸煮。**当原料经过腐蚀以后，一些粗硬的大块原料有了松解以后，再放入锅中，加热蒸煮。尤其是以鱼网做原料，比破布、绳头更难处理，因为鱼网都结有小结，坚硬不易粉碎，须以碱性水浸泡后加热才可使其结松软。再有，鱼网都涂有桐油、猪血之类的东西，颜色较深，不进行蒸煮，不易脱去油脂和脱掉颜色，处理不好，便影响纸的色泽，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工序。

**洗涤。**原料蒸煮后，从锅中取出，放在充满清水的木槽或缸中，进行清洗，使原料中混杂的泥垢清洗掉，同时也可去掉由于用灰水浸泡原料中含有的碱性，经过反复洗涤，使原料色泽变白为止。

**舂捣。**洗涤后的原料，质地开始松软。然后取出，放入石臼中进行舂捣。从东汉大量生产纸张和麻纸纤维的细小来看，舂捣用的石臼和木杵，可能装置了用脚踏的设备，减少用手舂捣力小易疲劳的情况。

再次洗涤。为了更好地清除原料中的泥污，舂捣以后，纤维更为松散，再放入水槽中或缸中进行反复洗涤，这样便可使由于纤维不松散残留的泥污被清洗掉，使原料的色泽变为白色。

打槽。经反复清洗，原料净化后，经过分解的纤维，就可凝聚在一起，这样就成为纸浆。放在大木槽里，准备进行抄纸。

抄纸。抄纸是先做好木框，框中敷有用细竹编织的竹帘，然后把纸浆泼在帘上，使帘上纸浆中纤维分布和交结平匀，漏去水分。

晒干。当纸浆泼在帘上，漏去水分以后，然后把木框放在日光下进行曝晒，使水分蒸发。

揭纸。纸晒干后，从框上揭下来，便成为纸。然后再用石压平使其平滑，便于书写。

经过蔡伦改进造纸技术后，生产的纸，比西汉以来的麻纸，明显地增加了白度，纤维交结和分布情况比西汉纸精细。这种平整光滑的纸，已经成为书写的工具，完全可以代替简牍和缣帛。

1974年，在甘肃省武威县旱滩修水利工程时，发现东汉墓，其中出土有木俑、牛车、木盒等物，在木车模型上粘附有带字的古纸，这可能是蔡伦改造技术后生产的纸，墓的年代和蔡伦生活的年代完全相符。墓的主人不是上层社会的人，而是一般平民，可见纸在当时已广泛普及到民间。

东汉末年，在蔡伦造纸技术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已能生产出优质名纸。有一个叫左伯的人，他生产的左伯纸，在东汉末年和张芝造的笔、韦诞造的墨，成为文坛名品。东汉末年，曹操派人到蔡文姬处请她写字，蔡文姬要求送来纸墨，可见在纸的使用上，已普遍到各个领域。纸的普及，对东汉学术和文化的发展，直接起了推进作用，尤其是对古代文献典籍的保存，提供了方便条件，也对文化的传播有很大影响。这种造纸技术以后传到中亚、西欧、东方各地，对世界文明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

蔡伦自永平末年入宫侍卫，历经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安帝等五代皇帝，三十多年间，忠诚于职守，得到历代皇帝的信任。从小黄门至中常侍、长乐太仆。在这期间，他改进造纸技术，推广造纸术，使纸成为书写材料，又监修经传。

延平元年（公元106年），安帝刘祜即位，邓太后摄政，蔡伦继续得到邓太后的信任，侍卫有功，封为龙亭侯，封地在汉中郡龙亭县（在今陕西省洋县东）。封侯以后，蔡伦更是尽心竭力。蔡伦不久也升为长乐太仆，即长乐宫的卫尉仆，地位很高，在少府之上，蔡伦做了太仆以后，可以直接承接太后旨意，朝廷一些政务，很多经他处理，因此蔡伦的声势也随之显赫起来。

邓太后从幼年时，即读诗书，留心经史，入宫以后，曾就曹大家（即班昭）学习经书和天文算数，白天协助皇帝处理政务，夜晚便诵史读经，学习每至深夜。从西汉以来，儒家经典，多系儒生整理加以传记。这些儒生，大都是各依家法和师说进行诠释，结果造成经传中文字上有许多脱漏和谬误。邓太后发现后，认为这种谬误会影响国家典章制度，必须加以校正。

蔡伦自幼读书，对于经史多所通晓，加上他做事认真负责，因此派他负责监修经典。蔡伦奉旨后，天天亲至东观主持校讎事宜，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全部经史校讎完毕。安帝对这项工作很为称赞，对蔡伦赏赐葛布若干，以作奖励。

永宁二年（公元121年），蔡伦的政治靠山邓太后死去，安帝开始亲理

政务。不久，安帝命令官员对自己的亲生祖母宋贵人被害致死一事进行追查。此一案件发生在很早以前，当时蔡伦曾参与案件之中，所以追查一开始，安帝便要求当事人之一蔡伦到廷尉那儿接受调查。蔡伦当时是在窦太后的威势之下，被迫去考查审理宋贵人姊妹，而造成宋贵人之死。对于这件事，蔡伦深深认识到自己应负重要责任。蔡伦是一个正直敦厚之人，感到自己所做的这件事，是一种耻辱，无颜到廷尉处受审，在十分内疚的心情下，沐浴后整理好衣冠，便在家中服毒自杀了。这样，一个对人民具有很大贡献的发明家，终因参与宫廷斗争的罪责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但是由他改进的造纸技术却永远被人民所称颂，并且对祖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撇开蔡伦在政治斗争中的功过不问，让我们详细而全面地考察一下蔡伦改进造纸术所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

蔡伦改进造纸术时试验成功的那一套操作过程，后来的人又不断地加以改进和完善，造出来的纸越来越精美。造纸用的原料，也因为各地方的出产不同，又有所扩大，如出产藤的地方，用藤皮作造纸原料；出产竹子的地方，用竹子作造纸原料；出产楮树较多的地方，用楮皮造纸；沿海地方，用海苔造纸。

造纸术的改进，对笔、墨、砚的要求提高了，使得笔、墨、砚也不断地有所改进，文房四宝之间形成了十分密切的关系。造纸术的改进，写字容易了，著书写文章的人越来越多，文化更加飞速地发展起来。造纸术的改进，对于中国的书法艺术和绘画艺术也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东汉以前，中国已经有了一些书法家和画家。东汉以后，有成就的书法家和画家更多了。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丰富，纸的用途也逐渐多起来，它不光是文房四宝之一，并且也能作包装食物和其他物品等用途。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没有文化的人，也是离不了纸的。

造纸技术的外传大致是分以下两个阶段先后进行的：首先是我国生产的纸张或纸制品（书籍或画幅等）被带往国外，其后是造纸的技术向外传播。

我国的造纸术首先是向东传入朝鲜的。我国与朝鲜只有一江之隔，人民间往来密切。中国造纸术大约是在四世纪末叶传入朝鲜的；从那时起，朝鲜人自己造纸，以满足各阶层用纸的需要。后来经由朝鲜，造纸术传入日本。

日本所采用的造纸术与中国的基本相同，只是在生产实践中又有所改进。

到了唐朝时期，我国造纸术经由大食传入了西方世界，而产生了巨大影响。

12世纪，欧洲可自造纸。其后，德国古登堡印刷所的建立，刺激了造纸业的发展。14世纪文艺复兴开始，对纸需要量骤增，读书看报的人多了起来，纸开始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起了积极作用，为欧洲文化的迅速推广发展提供了条件。

